

漢隋之間的車駕制度

劉 增 貴

器物是社會結構的反映，器物史的研究，不應只注目於名物度數的考證，也要探明其政治社會意義。古車形制復原的研究雖然很多，但車駕與社會的關係尚乏系統的論述，本文即為補足此一缺憾而作。

秦漢以下，古代象徵身份地位的器物如鼎彝等失去重要性，車服、印綬取而代之，《輿服志》的出現即其明徵。皇帝被稱為「車駕」、「輿駕」，士大夫也期望能「朱丹其轂」、「致輜駟」，漢磚中的車馬行列、魏晉以下的鹵簿圖都說明了車的象徵意義。等級分明的車制用意在「列等威」、「別士庶」與「抑僭奢」。但制度的變遷往往不只是「逾制」所造成，「不及」亦其一因，中古牛車之取代馬車，即與漢末清流士風密切相關。而乘肩輿、騎馬之風的漸盛，造成了另一變化，唐以下士大夫多騎馬坐轎，車駕制度也失去了其重要性。

一、前 言

在人類社會生活中，器物除了具有實用的工具價值外，也往往是權力、財富、身份地位的象徵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的結構及其變遷。作為交通工具的車正是明顯的例子。周代封建社會中，車馬與宮室衣裳、尊爵俎豆同為禮之重器，¹也是征伐、祭祀、燕享、賞賜所常用。所以荀子在強調禮的區別身份作用時，以「大路（輅）越席」作為天子的象徵²。這種別貴賤、序尊卑的作用，在封建制度崩潰之後依然存在。

事實上，車駕制度在漢隋之間具有特殊的地位。首先，秦漢一統帝國的凝

1 歐陽修等，《新唐書》卷一一〈禮樂志〉：「古者，宮室車輿以為居，衣裳冕弁以為服，尊爵俎豆以為器，金石絲竹以為樂，以適郊廟，以臨朝廷，以事神而治民。」此處所謂古者是指三代。

2 見《荀子·禮論》。

成，出現了車同軌的局面以及全國性的道路建設，使車的使用更為廣泛，勞幹指出，漢代漢人之所至，即車之所至，與後世江淮以南少用車者不同³。這種情況六朝猶然。⁴其次，自封建制度崩潰以後，象徵身份地位的器物如鼎彝等逐漸退出歷史舞臺，而車服、宮室、印綬等取得了新的地位，尤其車服最為重要，後漢以下史書中〈輿服志〉的出現說明了這點。⁵漢隋之間的车駕制度又較後世重要，因為唐以下官吏多騎馬坐轎，車駕制度雖存，僅供典禮儀式之用，其重要性遠遜於前。

隨著考古發掘的進展，我們對車制的認識也增進了不少，然而大部份的研究都從科技史的角度出發，偏重車身結構的復原，對車制與社會的關係尚乏系統的論述。本文主要討論車駕制度所具的政治社會意義，尤其注重其區別身份的作用，對車身結構變化僅就其具社會意義者討論，至於車在各種典禮中的應用，留待另文處理。

漢隋之間車制的重要性如何？車制等級如何區劃？定制的考慮何在？制度與實際情況是否符合？這些都是本文討論的主題。車制的一大變化是牛車的興起，漸與馬車並駕齊驅，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甚至超過馬車，何以有這種變化？這種變化具有什麼社會意義？也是本文嘗試解答的。

二、車的政治社會意義

在近代機械文明之前，仰賴畜力的車是傳統中國的重要交通工具，在古代社會中，其作用又不止於交通工具而已，梁朝甄玄成的〈車賦〉說得非常清楚：⁶

3 勞幹，〈論漢代之陸運與水運〉，頁72-73。

4 南朝士大夫多乘車，顏之推，《顏氏家訓》（王利器集解本）卷四〈涉務〉：「梁世士大夫，皆尚褒衣博帶，大冠高履，出則車輿，入則扶持，郊郭之內無乘馬者。」（頁295）雖是比較車與馬，但亦可見南方乘車者之普遍。

5 史書中的〈輿服〉一志，始於司馬彪《續漢書》，然其所本則為漢末蔡邕之〈車服意〉（即《東觀漢記》中之〈車服志〉，見劉知幾，《史通》卷一二〈古今正史〉，頁294。〈車服意〉現存只九條，本文及考證詳見吳樹平，〈蔡邕撰修的《東觀漢紀》十志〉，頁172-221，收於所著《秦漢文獻研究》。

6 見嚴可均校輯，《全梁文》，卷六八，頁7。

爾其車也，名稱合于星辰，圓方象乎天地，夏言以庸之服，周曰聚焉之器，……古今貴其同軌，華夷獲其兼利。爾其利也，天子以郊祀田伐，諸侯以朝聘會盟，庶人以商農工賈，夷狄以致蓄遷生。

由此看，車除了是交通工具外，又具有廣泛的政治社會及文化意義，自先秦以迄六朝皆然，這裡稍作疏釋。首先，古人認為車制上應天文，下合地理。天有「軫」星，主車，又有「庫星五車」。⁷〈孝經援神契〉云：「斗曲杓橈，象成車。房爲龍馬，華蓋覆鉤」，宋均注曰：「房星既體蒼龍，又象駕駟馬，故兼言之也。」⁸從車的結構看，《續漢書·輿服志》云：「後世聖人觀於天，視斗周旋，魁方杓曲，以攜龍、角爲帝車，於是迺曲其輶，乘牛駕馬，……」⁹是輶有仿於天文。又《周禮·考工記·輶人》：「軫之方也，以象地也，蓋之圓也，以象天也，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，蓋弓二十有八，以象星也。」是車體之軾、蓋、輪、弓亦仿天地。這類說法雖屬附會，亦可見古人對車的重視。¹⁰

製車需要高度的工藝水準，精密的分工，衆多的人力，《周禮·考工記》：「有虞氏上陶，夏后氏上匠，殷人上梓，周人上輿，一器而工聚焉者，車爲多。」製車用到木、毛、革、銅、金銀、漆等不同的材料及技術，從考古發現的車來看，一車零件有多至三千件者¹¹，因此車不是一般人所能有，有車者大多是統治者。事實上，車在古代社會正是政治權力的象徵。從戰爭形態上看，古代戰爭以車爲主，車轍所及即是勢力所及，所謂「日月所照，舟輿所載」。雖然古代的車可大別爲兩類，即「乘車」與「兵車」，但就實際結構言，兩者並無不同。後世乘車制度

7 見司馬遷，《史記》卷二七〈天官書〉，頁1304。

8 司馬彪，《續漢書》志卷二九，〈輿服〉（附於范曄，《後漢書》後，以下簡稱《續漢志》），頁3642-3643，劉昭注所引。

9 同上書，頁3641。

10 考古發現的車，與周禮所說未必符合，以輪輻論，戰國以前的輪輻多不及三十，（參考許倬雲，〈周代的衣食住行〉。）又如秦陵銅車馬，輪輻雖有三十，但蓋弓卻有三十六。（參袁仲一、程學華，〈秦陵二號銅車馬〉，收於陝西省秦俑考古隊、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，《秦陵二號銅車馬》）北京大葆台漢墓（據考爲元帝時廣陽頃王劉建之墓），出土的三輛車（實物），其車輪之輻在二十四至二十六間。參考大葆台漢墓發掘組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，《北京大葆台漢墓》，頁77-79。

11 見袁仲一、程學華，前揭文。又袁仲一，〈秦陵二號銅車馬的形制及系駕方法〉（收於袁仲一等編，《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論文選》），頁265。

中的鹵簿儀仗，實際上是起於兵車。先秦國力大小以兵車計，所謂萬乘、千乘、百乘之國即指兵車而言。一乘的大小，《管子·乘馬》、《司馬法》等各有不同的說法¹²，這裡試舉班固的說法。《漢書》卷二三〈刑法志〉：¹³

甸，六十四井也，有戎馬四匹，兵車一乘，牛十二頭，甲士三人，卒七十二人，干戈備具，是謂乘馬之法。一同百里，提封萬井，除山川沈斥，……定出賦六千四百井，戎馬四百匹，兵車百乘，此卿大夫采邑之大者也，是謂百乘之家。一封三百一十六里，……兵車千乘，……是謂千乘之國。天子畿方千里，……兵車萬乘，故謂萬乘之主。

天子諸侯勢力的大小，以兵車之數計，六十四井才出得起一乘兵車。古代的賦，主要為車馬之費（迄漢猶然），可見其重要性。

古代軍事與政治原不可分，車是國力的表現，也是政治地位的象徵，可說是一種政治符號。《尚書·堯典》云：「五載一巡守，群后四朝；……明試以功，車服以庸。」天子賜車服予諸侯，表顯其功。西周以下的銅器銘文中，常有給予身份職事，同時錫以車服的記載¹⁴。《左傳·成二年》：「唯器與名，不可以假人。」杜預注：「器，車服；名，爵號。」車服與爵號都象徵政治地位，故不可以假人。《國語·魯語上》載孟文子答魯文公：「夫位，政之建也；署，位之表也；車服，表之章也；宅，章之次也；祿，次之食也。君議五者以建政，為不易之故也。」根據孟文子的說法，車服是地位的表章，宮室是有車服者的居所。一直到漢代，車尚與宮室相提並論，劉熙在《釋名》中還說：¹⁵

車，古者曰車，聲如居，言行所以居人也，今曰車，車舍也，行者所處若車舍也。

12 《管子·乘馬》：「六里為一乘之地也，一乘者，四馬也。……其甲二十有八，其蔽二十，白徒三十人，奉車兩器制也。」《司馬法》則有兩說，一是「革車一乘，士十人，徒二十人。」一是「長轂一乘，戎馬四匹，牛十二頭，甲士三人，步卒七十二人。」後說即下文引班氏所本。杜正勝認為此兩說反映兵制的不同階段，前者在春秋前期，後說則在春秋中期以下。參考杜正勝，《編戶齊民——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》，頁62-72。

13 《續漢志》卷二八，〈百官五〉，頁3631-3632注引劉劭〈爵制〉及《晉書》卷一四〈地理志〉頁412-413略同。

14 參考杜正勝，〈周禮身分制之確立及其流變——特從隨葬禮器論〉。

15 見劉熙，《釋名》卷四〈釋車〉，頁九。按註一所引《唐書》「宮室車輿以為居」亦以車為居處。

車即是流動的屋子（秦漢王者之車猶稱「黃屋」），與宮室雖有動靜之分，其作用相同，這個說法反映了古人對車的觀念。古代「車」「居」通假互用，劉熙的解釋有相當的根據。¹⁶

車既是身份地位的象徵，則自具有較嚴格的等級區劃。《逸禮·王度記》曰：「天子駕六馬，諸侯駕四，大夫三，士二，庶人一。」以所駕馬數為別。¹⁷所乘的「車輿」也不同，《周禮·巾車》載王有玉、金、象、革、木「五路」，王后也有五路，至於卿以下制度如下：

孤乘夏篆，卿乘夏縵，大夫乘墨車，士乘棧車，庶人乘役車。

鄭玄注：「夏篆，五彩畫轂約也；夏縵，亦五彩畫，無瑑爾；墨車，不畫也；棧車，不革輓而漆之；役車，方箱，可載任器以共役。」這種以車飾、材料、馬數等劃分等級的規定，在於使「尊卑上下，各有等級」¹⁸，可說是秦漢以下車駕制度的遠源。

就社會上看，乘車者的社會地位甚高。統治階級不可無車，《論語·先進篇》記載了一則故事：顏淵死，其父顏路請賣孔子之車以為之槨。孔子說：「鯉也死，有棺而無槨；……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可徒行也。」孔子為大夫，故必須有車。楚莊王時，楚國好乘庫車，王以為不便馬，欲下令高其車，孫叔敖認為只要下令加高閭里的梱（門限）即可，因為「乘車者皆君子，君子不能數下車」，有車者都是統治階層，所謂「古者必有命（指爵命）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」¹⁹。《禮記·曲禮下》：

問士之富，以車數對。問庶人之富，數畜以對。

可見車具有象徵階級身份與財富的雙重意義。

16 「車」「居」上古音同屬見母魚部字，故相通。《毛詩·北風》：「攜手同車」，1977年在阜陽所發現的漢簡《詩經》中作「攜手同居」，校釋者指出：「《莊子·徐死鬼》：『乘日之車』《莊子釋文》：『司馬云，以日為車也，元嘉本車作居。』」（見胡平生，〈阜陽漢簡《詩經》異文初探〉，收於胡平生、韓自強編著，《阜陽漢簡詩經研究》）又參胡念耕，〈「車」、「居」同音可以假借〉。

17 《續漢志》卷二九〈輿服〉，頁3645劉昭注所引。

18 同上，頁3640-3641。

19 孫叔敖言見《史記》卷一一九，〈循吏列傳〉，頁3100。有命始得乘車為王符之言，見《後漢書》卷四九本傳，頁1635。李賢注：「尚書大傳曰：『古之帝王者必有命，……命於其君得乘飾車駟馬，……』」

春秋以下，禮壞樂崩，從考古發現看，周代早期、中期墓葬車馬器多少，與銅器多少成比例，是身份階級的表徵，但到了晚期，一鼎之墓亦有車馬器，正說明有車馬者的普遍。²⁰ 隨著庶人的興起，其經濟能力亦足以擁有車馬，士庶之界限漸泯。然而大體而言，秦漢六朝，車仍然是重要的政治符號與社會指標，這可從幾點來看。

首先，秦統一天下之後，採取了「車同軌」的措施，規定輿六尺（指車廂寬，據實測，輪在外側故更寬，軌七尺二寸，仍是六的倍數，約當今二公尺²¹）車制的統一正是一統帝國的象徵。此外，秦繼承了六國繼續發展的制度，「攬其輿服」，建立了一套新的車駕制度，作為劃分身份尊卑的工具。這套制度雖不同於周禮，但也沿襲了其中不少的制度，對後世產生深遠的影響。²²

車作為一政治符號，也可於對皇帝的稱呼中見之。秦漢皇帝被稱為「車駕」、「輿駕」、「乘輿」、「輦轂」，何以有此稱呼呢？蔡邕《獨斷》云：²³

漢天子正號曰皇帝，……史官記事曰上，車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輿，所在曰行在所，所居曰禁中，……天子至尊，不敢渫瀆言之，故託言於乘輿

20 杜正勝，前揭文。

21 軌寬據秦陵二號銅車馬按比例放大，為秦尺七尺二寸，（約二公尺）也是六的倍數，參考秦俑考古隊，〈秦始皇陵二號銅車馬初探〉，頁19。另滿城漢墓出土的十輛車實測，也得到同樣的寬度。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、北京儀器廠工人理論組編寫，《滿城漢墓》，頁30。最近發表的大葆台漢墓出土三輛車的實測，其軌寬皆約當二公尺，與上述相合。見前揭《北京大葆台漢墓》，頁77。

22 秦的車制多是總攬古代及六國之制，例如皇帝之金根車，是採殷的瑞山車，與《周禮》王之玉路不同，又其屬車八十一乘，是綜合六國諸王後車所得。再以警蹕之制言，《周禮》蹕而不警，秦則出蹕入蹕，這些都不同於周。（參考馬非百，《秦集史》，〈輿服志〉，頁501-508。）但是金根車上的樊纓、旗旂都與《周禮·巾車》的玉路相同。見《續漢志》卷二九〈輿服上〉，頁3640。《唐書》卷一一〈禮樂志〉指出：「及三代已亡，遭秦變古，後之有天下者，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、國家制度、宮車服器，一切用秦，……」。

23 見蔡邕《獨斷》，頁1-2。乘輿不但是習稱，也見諸漢律，蔡氏云：「乘輿出於律，律曰：敢盜乘輿服御物，謂天子所服食者也。」是則乘輿是天子服御物之代稱，因不敢指斥天子，故復以之為天子代稱。另「車駕」等常見，不備舉。「輦轂」見《漢書》卷六十二〈司馬遷傳〉，頁2727-2728、同書卷九八〈元后傳〉頁4021-4022。輦為天子之所乘，故以為代稱，《晉書》卷二五〈輿服志〉：「輦，案自漢以來為人君之乘，魏晉御小出即乘之。」（頁755）「輦轂」又簡稱「轂」，《漢書》卷七六〈王尊傳〉：「賊數百人在轂下」，顏師古注：「在天子輦轂之下，明其逼近也。」（頁3233）。

也。……天子以天下爲家，不以京師宮室爲常處，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，故群臣託乘輿以言之，或謂之車駕。

天子當巡行天下，後漢胡騰也指出：「天子無外，乘輿所至，即爲京師。」²⁴可與蔡邕之言相證。但京師畢竟爲天子所居，所以被稱爲「京輦」或「轂下」。天子崩，謂之「晏駕」或「宮車晚出」²⁵。以車駕指統治者，雖可能有更早的淵源，但作爲天子之代稱是秦漢以下之制。元代方回指出：

史記書（車）駕入都關中，不敢指斥天子，以駕書、以車書始此。然駕又曰行，……（始皇）三十五年書曰：「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」，於是以天子之車駕曰行，……近世南渡後呼臨安曰行都，又曰行在所者，此也。

此說大體可信。²⁶

就官爵言，秦漢有二十等爵，爵位高低與車關係密切。如民爵的最高爵爲「公乘」（屬第八爵），意謂可乘公家之車。十七等曰「駟車庶長」，出得駕駟。²⁷太守上任曰「下車」，刺史稱「傳車」，刺史之屬官有「別駕」²⁸，而官吏退休，仍稱「懸車」，從前漢薛廣德懸其安車看來，古代懸車之制仍存。²⁹這些都是以車

24 《後漢書》卷六九〈竇武傳〉，頁2245。

25 「京輦」見《後漢書》卷六一〈周舉傳〉，頁2030；卷七四上〈袁紹傳〉，頁2387；卷七七〈周紆傳〉，頁2495。胡廣《漢官解詁》頁8云：「轂下，喻在輦轂之下，京師之中。」「晏駕」，《史記》卷七九〈范雎傳〉，頁2415集解引韋昭曰：「凡初崩爲『晏駕』者，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。」

26 見方回《續古今考》卷二三〈附論車駕並行在所〉條，頁4。

27 見《續漢志》卷二八〈百官志〉頁3631-3632，注引劉劭〈爵制〉。

28 「下車」熟語，如前漢成帝時班伯爲定襄太守，郡人畏其下車作威（《漢書》卷一〇〇上，〈敘傳〉，頁4199），此太守上任。光武時趙熹爲懷令，下車即收考大姓李子春（《後漢書》卷二六，〈趙熹傳〉，頁913-914），此縣令上任。「傳車」是刺史所乘之車，駟駕，赤帷裳（《續漢志》卷二九〈輿服志〉，頁3648注引《謝承書》），刺史所以稱「傳車」，可能因爲刺史具有使者身份，代表皇帝巡行，初無固定居所，相對於下車任官者，故稱「傳車」，參考《三國志》卷九〈夏侯玄傳〉，頁298，司馬懿報玄書。別駕爲刺使之屬官，其名稱似亦取義於此。

29 班固，《白虎通義》六，「致仕」：「臣年七十懸車致仕者，……所以長廉恥也，懸車示不用也。」，見頁207。《漢書》卷七一〈薛廣德傳〉：「（爲御史大夫）……與丞相于定國、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，皆賜安車駟馬、黃金六十斤，罷。……沛以爲榮，縣其安車傳子孫。」顏師古曰：「致仕縣車，蓋亦古法。」（頁3048）東漢的陳寔、張儉晚年也都縣車不出。參考《後漢書》卷六二及六七，兩人本傳。

代表權力之例。

皇帝仍常以車馬賞賜大臣，不只是作為財物相贈，也表示地位之尊崇。例如前漢梁孝王車騎皆帝所賜，後漢的杜林、郭賀、張酺皆被賜車馬。獻帝賜司徒淳于嘉以玄纁駟馬，孫權賜賀齊以駟車駿馬，皆其著例。³⁰漢迄六朝，大臣退休，例皆賜以安車駟馬以示尊崇，³¹至於封爵時錫以車馬，猶有先秦遺風。³²異族君長入朝，也常賜以車馬，如漢宣帝賜呼韓邪單于安車駟馬，和帝賜北匈奴谷蠡王羽蓋車，順帝賜南匈奴單于「青蓋駕駟、鼓車、安車、駟馬騎、王具刀劍、什物。」袁紹賜烏桓三王為單于，「皆安車、華蓋、羽旄、黃屋、左纛。」³³其最具政治象徵意義的是易代之際及九錫之禮中車的作用。如劉焉欲自立，先造乘輿車具千餘乘，史評其「圖竊神器」。曹操之王，漢獻帝命其「設天子旌旗，出入稱警蹕，…王冕十有二旒，乘金根車，駕六馬，設五時副車。」³⁴其後司馬懿、桓玄、石勒、劉裕、蕭道成、蕭衍、陳霸先等篡位之前，都經過此一備具天子車乘的階段。³⁵至於九錫，據《禮含文嘉》，是指車馬、衣服、樂器、朱戶、納陛、武賁、鈇鉞、弓矢、鉅鬯。車馬仍為重要項目，王莽、曹操皆行之，晉以下遵行不替。³⁶

社會方面，車馬仍有標示身份之作用。董仲舒云：「乘車者君子之位也，負

30 見《史記》卷一〇八〈韓長孺列傳〉，頁2857-2858。《後漢書》卷二六〈郭賀傳〉，頁908-909；同書卷二七〈杜林傳〉，頁936；同書卷四五〈張酺傳〉，頁1528-1529。淳于嘉見《續漢志》卷四〈禮儀上〉，頁3105注引〈獻帝傳〉。賀齊見《三國志》卷六〇本傳，頁1379。

31 如前漢的杜延年、黃霸、趙廣漢、于定國、史丹、史高、薛廣德、張禹等皆其著例（見各本傳），其有不賜者，有特殊原因，如彭宣於王莽時求退，莽不悅，故不賜安車駟馬（《漢書》卷七一本傳，頁3051-3052）。《晉書》卷二五〈輿服志〉：「三公、九卿、中二千石、二千石、河南尹、謁者僕射……其去位致仕告老，賜安車駟馬。」（頁762）。

32 如樂大封侯，賜甲第及乘輿斥車馬（《史記》卷一二〈孝武本紀〉，頁463-464）；後漢城陽恭王祉、卓茂、杜林、桓榮、張酺等皆於封爵或除官時受賜，見《後漢書》各本傳。

33 見《漢書》卷八〈宣帝紀〉，頁271；《後漢書》卷四〈和帝紀〉，頁173注引《東觀記》；同書卷八九，〈南匈奴列傳〉，頁2962-2963；《三國志》卷三〇〈烏丸傳〉，頁834-835。

34 《三國志》卷三一〈劉二牧傳〉，頁867，870。頁同書卷一，〈武帝紀〉，頁49。

35 見《晉書》、《宋書》、《南齊書》、《梁書》、《陳書》（皆新校標點本）各本紀及本傳。

36 《漢書》卷九九上〈王莽傳〉，頁4073、4075；《後漢書》卷七〇〈荀彧傳〉，頁2290-2291；同書卷九〈獻帝紀〉，頁387注引〈含文嘉〉。

擔者小人之事也。」³⁷《晉書·五行志上》亦云：「夫乘者，君子之器。」這些觀念雖沿自先秦，但仍有其作用。例如漢靈帝駕驢，即被史家評為「野人之所用」³⁸正如東漢的張衡所指出的：「器賴彫飾為好，人以輿服為榮。」³⁹《後漢書》卷三七〈桓榮傳〉：

……而以榮為少傅，賜以輜車、乘馬，榮大會諸生，陳以車馬、印綬曰：「今日所蒙，稽古之力也，可不勉哉！」

車馬、印綬皆漢代象徵身份之器，猶周之鼎彝，為時人追求之目標。故士人之願，在於能「朱丹其轂」或「致輜駟」。⁴⁰司馬相如初入長安，題其門：「不乘赤車駟馬，不過汝下。」⁴¹東海于公冀望後世昌盛，命高大閭門，令容駟馬高蓋車⁴²。孔融為北海相，特改鄭玄所居為「鄭公鄉」，出教謂：「……乃鄭公之德，而無駟牡之路！可廣開門衢，令容高車，……」⁴³劉備幼時戲樹下云：「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！」⁴⁴晉代蘇彥的《蘇子》中提到世俗之所謂榮華富貴，是擁有印綬官爵而遊五里之衢，「走卒警蹕，叫呼而行。」⁴⁵南齊的王融也曾說：「車中乃可無七尺，車前豈可乏八騶。」⁴⁶都可見當時人的願望。做官不可無車，西漢司馬相如久宦不遇，唯餘車馬；貢禹被徵，賣田百畝以供車馬；⁴⁷吳時唐滂《唐子》云：「（君子）出門不冠則不敢行，行非輿則不可步。」⁴⁸南齊高帝卒，王琨聞訊，牛不在宅，步行入宮，朝士認為「故宜待車，有損國望。」⁴⁹上文孔子君子「不可徒行」的觀念仍存。

37 《漢書》卷五六〈董仲舒傳〉，頁2521。

38 《後漢書》卷八〈靈帝紀〉，頁346。

39 同上書卷五九〈張衡傳〉，頁1879。

40 《漢書》卷八七下〈揚雄傳〉，頁3566；《南史》卷六〇〈徐勉傳〉，頁1483-1484。

41 見常璩，《華陽國志》，卷三〈蜀志〉，頁227。

42 《漢書》卷七一〈于定國傳〉，頁3046。

43 俞紹初輯校，《建安七子集》，卷一〈告高密縣立鄭公鄉教〉，頁一三。

44 《三國志》卷三二〈先主傳〉，頁871-872

45 蘇彥，《蘇子》，頁1。

46 《南史》卷二一〈王融傳〉，頁576。

47 《史記》卷一一七〈司馬相如列傳〉，頁3000；《漢書》卷七二，〈貢禹傳〉，頁3073。

48 唐滂，《唐子》（《玉函山房輯佚書》本），頁一。

49 《南史》卷二三〈王琨傳〉，頁628。

從考古發現來看，先秦大墓葬前常有車馬坑，規模大的車坑與馬坑通常是分開的，車體也常拆散分置（例如將輪置於一處），坑中很少發現車轆，有些墓只有拆下的車馬飾，因此，這些車馬中有許多顯然不完全是供死後世界使用的，而是作為象徵身份的器具。⁵⁰秦漢以下，車馬坑逐漸消失，陪葬真車馬的也愈來愈少，⁵¹但車馬形象幾乎是陪葬品中不可少的內容，它以三種形式顯現：一是車馬模型（銅、木、陶等），二是車馬飾與車馬零件，三是車騎行列圖畫（畫像石、畫像磚、壁畫等）。第一種雖可說為死後世界之用，但第二種以車飾及零件陪葬，顯然不可乘坐，仍是表章身份的傳統。事實上，車之等級正是以車飾來表現的（見下節）。第三種常是畫死者生前出行的情形，其誇耀身份的作用更是明顯。

車仍為經濟地位的象徵。漢武帝時即特別「算輶車」，一車要繳一算（一百二十錢），與人頭稅相等，商人則加倍。《史記·平準書》：「異時算輶車、買人緡錢皆有差，請算如故。……非吏比者三老、北邊騎士，輶車以一算，商賈人輶車二算；……」據此則可能武帝以前即已算輶。有輶車者不是商人就是官吏，皆有相當資產。⁵²從上文所引貢禹賣田百畝，即可見車馬雖普遍，價格仍高。田百畝，合十金，約為當時中家之產，這是內地的價格。從漢簡中看，一馬的輶車值九千，田則百畝一萬，與貢禹之例相較，其價雖因邊郡與內地相距甚遠，但一輛車馬都約當於百畝田。⁵³當時邊塞官吏的奉錢，侯官三千，尉及塞尉月二千，尉史

50 參考林巳奈夫，〈後漢時代の馬車（下）〉，頁12，註9。

51 漢代車馬坑很少見，1978年在安徽六安發現西漢的車馬坑，有二車四馬，並有人殉，據推測很可能屬附近某封君墓（六安縣文物管理所，〈安徽六安發現西漢車馬坑〉）。事實上，漢代以真車馬葬者已很少，只有在諸侯王或封君墓中才有，且以車馬室（耳室）代替車馬坑，如滿城的中山王夫婦墓、曲阜九龍山的魯王墓、洛陽東關的殉人墓皆是。北京大葆台廣陽王墓的車馬則出現於墓道中。見前揭《滿城漢墓》，頁28-31；《北京大葆台漢墓》，頁74；山東省博物館，〈曲阜九龍山發掘簡報〉；余扶危、賀官保，〈洛陽東關東漢殉人墓〉。

52 《史記·平準書》：「異時算輶車、買人緡錢皆有差，請算如故。」則元狩四年緡錢令之前早已算輶車，「異時」或以為指武帝元光六年的「初算商車」，但以元狩四年算輶所及不只商賈看，則異時之政並非只指商車，可能更早即已算輶。

53 此據居延漢簡中編號37·35的「禮忠簡」估計，輶車價是將簡中輶車與馬價合計而得（輶車二乘直萬，用馬五匹直二萬）。簡見勞幹，《居延漢簡·考釋之部》，頁57，圖137葉。唯釋文中「輶車一乘」據原簡為「輶車二乘」之誤。

九百，下層的書佐月僅三百六十，⁵⁴具馬車仍不易，相較之下，一兩牛車約值五千⁵⁵，故為庶民常乘，這也是其後牛車盛行的原因之一。

總之，車作為政治社會地位的象徵，在漢隋之間非常重要，尤其在古代鼎彝等器失去作用之後，其重要性更為凸顯。以下試作進一步的討論。

三、車之形制與等級區劃

《隋書》卷一〇〈禮儀五〉：「輿輦之別，蓋先王所以列等威也。」一語道出了車駕制度的作用。秦承六國之變，兼有天下，也建立了一套車駕制度，並為漢所沿襲。這套制度大體上可分為兩部分，一是規定皇帝、各級官吏至平民所乘車之形製，二是規定了車隊行列的制度，兩者都具有「列等威」的作用。本節先討論第一點。

漢隋間的車是依乘坐方式、車形、駕畜種類及數目、車馬飾、應用場合分為許多不同的等級。乘坐方式有兩種，《晉書·輿服志》云：「坐乘者謂之安車，倚乘者謂之立車，亦謂之高車。」立車起於古之戰車，因為立乘，蓋高，所以又稱高車，其形制可見於1980年發現的秦陵一號銅車馬（形如輶車而蓋高，見附圖二，據考為皇帝五時副車之一）。立車駕駟或二馬（所謂「立輶併馬」），是漢代高官在出席正式場合（「法出」）時所乘，所以「高車」幾乎是高官的代名詞⁵⁶，上文引東海于公高大閭門「令容駟馬高蓋車」即是。至於安車，則上至天子，下至平民皆用為常乘，有許多不同的車形。高級的如皇帝的駟馬安車（見圖三之秦陵二號銅車馬），是輶輦類車，普通的則為吏所乘「蓋卑坐乘」的小車⁵⁷。

以車形來看，可分為輶、輦、輶、軒、輦、露車、棧車等。輶、輦等級較高，

54 參考陳直，〈居延漢簡綜論〉（收於所著《居延漢簡研究》），頁21-22。

55 牛車價見前揭禮忠簡是將牛與牛車箱合計。

56 《後漢書》卷二七〈郭丹傳〉：「後從師長安，買符入函谷關，乃慨然歎曰：『丹不乘使者車，終不出關。』……更始二年，三公舉丹賢能，徵為諫議大夫，持節使歸南陽，安集受降。丹自去家十有二年，果乘高車出關，如其志焉」。這是因使節車立乘之故。

57 關於安車的類型，據考有大小兩種，大型可坐乘亦可臥息，如皇帝的安車或輶輦車，小型的則有高官所乘，可施帷帳的安車以及一般吏所乘「蓋卑坐乘」的小車，參袁仲一、程學華，前揭文，頁47。又武伯綸，〈秦漢車制雜議〉亦有考證。

輜、軒爲官吏常乘，而一般人則乘「輦」、露車或棧車。輜、輦是有蔽的車（見圖四），兩者的差別是輦車四面都有衣蔽，而輜車則前無衣蔽，輦車大多是女子所乘，而輜車則男女通乘⁵⁸。輜車無蔽，《釋名·釋車》所謂「輜，遙也，遠也，四向遠望之車也。」是吏民都可乘坐的輕便車，在漢畫中出現也最多。（圖五、六、七）「軒」是兩邊有藩板的車，古代大夫乘之，秦漢亦官吏所乘（圖四）。「輦」（圖五）是大車，有卷棚，據考是馬拉牛車箱者，故或謂之「方箱」或「方相」，可載物兼載人⁵⁹。漢制規定，天子駕車有乘輿、金根、耕根等特別形制，是六馬或四馬駕的有蓋、無衣蔽大車，不在上列。天子常御的安車，皇太后、太皇太后常御（非法駕）的紫闕輦車，長公主的赤闕輦車，大貴人、貴人、公主、王妃、封君的油畫輦車，都是輜輦類的安車。皇太子、皇子的「王青蓋車」，皇孫的「綠車」，公、卿、二千石的安車都屬於輜車類的安車。公、列侯、中二千石、二千石夫人朝會乘其夫的安車，加交絡帷裳，平常則乘漆布輜輦車⁶⁰。官吏所服多是輜輦輜軒，至於賤者所服的车除輦外，又有柴車、輦車、棧車、露車、鹿車。柴車、輦車、棧車等，大多是載物兼載人，且用駕馬或牛駕⁶¹。《漢舊儀》載：「丞相有它過，使者奉策書，即時步出府，乘棧車歸田里。」⁶²可見即使丞相有過免官，成爲平民，也只乘棧車。顏師古云：「柴車即棧車」⁶³，大體就其構成之材料以柴而言。至於露車是無頂的車，鹿車則爲手推車，《風俗通義》：「窄小裁容一鹿也。」⁶⁴《後漢書》卷七四上〈袁紹傳〉：「士無貴賤，與之抗禮，輜輦柴轂，填接街陌。」輜輦柴轂有貴賤之分，紹雖俱與抗禮，但其身份表現於車制上畢竟

58 參趙化成，〈漢畫所見漢代車名考辨〉。

59 諸車可參趙化成，前揭文。方相考見勞幹，《居延漢簡·考釋之部》，頁20。

60 皆見《續漢志》卷二九〈輿服上〉。

61 《漢書》卷九九〈王莽傳〉載唐尊爲太傅，「乘牝馬柴車」，顏師古曰：「柴車即棧車」，是柴車、棧車猶以馬。但後漢末的士大夫多貧窶，所乘柴車已多用牛，《後漢書》卷八三〈韓康傳〉：「（亭長）及見康柴車幅巾，以爲田叟也，使奪其牛。康即釋駕與之。」可證。

62 《漢書》卷八一〈孔光傳〉，頁3358-3359注顏師古引。

63 引見註六一。

64 應劭著，王利器校注，《風俗通義校注》〈佚文〉頁614：「鹿車，窄小裁容一鹿也。」但接著的文字是「或云樂車，乘牛馬者剝斬飲伺達曙，今乘者雖爲勞極，然入傳舍，偃臥無憂，故曰樂車。」此又一說法。

不同。上述諸車中只有「輅」最普遍，無論貴賤都有乘輅者，不過其馬數、車飾等仍有嚴格的區劃。

漢代對不同等級之馬數皆有規定。例如皇帝所駕六馬，而副車則駕駟。皇太后、太皇太后法駕亦金根四馬。紫闕駟車三馬，長公主以下之赤闕駟車、油畫駟車駕二馬，皇太子皇子、皇孫安車皆三馬，公、列侯安車，中二千石以上二馬，以下一馬（包括其妻在內），只有在大典禮中，公、卿、中二千石、二千石才得乘立乘之駟馬，平常乘安車。此外使節車（大使車）因代表皇帝，故駕駟。皇帝也常以「安車駟馬」來特賜給退休官吏、公卿或以供有名望的士人乘坐以示尊崇。⁶⁵不過前漢規定並不嚴格，例如呂后時陸賈病免家居，常安車駟馬，而武帝時會稽太守朱買臣，上任時也駕四馬車⁶⁶。

馬數並非最重要的標準，東漢服虔即指出：「大路，總名也，如今駕駟高車矣。尊卑俱乘之，其采飾有差。」⁶⁷按駕駟高車（立乘）通用於皇帝、大臣及使者，駕駟與否無法別其等級，所以更重要的是采飾，即車馬裝飾及佩件。采飾是分別等級最重要的標誌。例如天子的金根車是以金玉為飾，其樊（鞶馬之大帶）以金塗十二重，纓（馬胸前飾）則旄尾，建旗十二旂，長九仞（六丈三尺）曳地，上畫日月升龍，輪是朱班重牙，貳轂、兩轄，較上倚金薄繆龍，文虎伏軾（所謂「倚龍伏虎」）龍首銜軛、鸞雀立衡，左右有吉陽箭，虞文畫轡（鹿頭龍文），羽蓋華蚤（翠羽蓋黃裡），象鑣縷錫（象牙鑣、金當盧）、金鈹方鈇（金馬冠及馬冠後之物）插翟尾，以鰲牛尾在左駢馬軛上為纛，大如斗，叫「左纛」，有四時馬色，白馬尾則染紅為「朱鬣」。這就是「黃屋左纛」之車。另有飛軫，以緹油布畫左蒼龍右白虎繫軸頭，（二千石亦有，但無畫）。皇帝之下，各級車也都有裝飾，⁶⁸，試表列其等級如下：

65 以上見《續漢志》卷二九〈輿服上〉。

66 見《史記》卷九七〈陸賈傳〉，頁2699-2700；《漢書》卷六四上〈朱買臣傳〉，頁2792。

67 《續漢志》卷二九〈輿服下〉，頁3644劉昭注引服虔。

68 見《續漢志》卷二九〈輿服上〉。

表一 東漢車飾等級

身份車飾	皇帝	太皇太后 太后	太子 諸侯王	公、列侯	卿	二千石 中二千石	千石	六百石	三百石	二百石下	吏	民	賈人
旂、旂	12旂 9仞 日月升龍	12旂 9仞 日月升龍	9旂 7仞 降龍	9旂 7仞 降龍	5旂 降龍								不得乘馬車
樊纓	12就	12就											
輪	朱輪班牙	朱輪班牙	朱班輪	朱班輪									
飛軫	蒼龍白虎	蒼龍白虎	鹿文	鹿文	鹿文	無畫							
較軾	倚龍伏虎	倚龍伏虎	倚鹿伏鹿	倚鹿伏熊									
衡	鸞	鸞											
蓋	羽蓋華蚤	羽蓋華蚤	青蓋華蚤	皐繒	皐繒	皐繒	皐繒	皐布	皐布	白布			
幡	文畫 *	文畫	文畫	黑	朱	朱	朱左	朱左					

輓	龍首衡	吉陽筓	吉陽筓	吉陽筓	吉陽筓	吉陽筓	吉陽筓	吉陽筓					
輓	文	雲文	文畫										
杠	四維杠衣	四維杠衣	四維杠衣	四維杠衣	四維杠衣	四維杠衣	四維杠衣	四維杠衣	四維杠衣	四維杠衣	赤畫	青	
五末	金	金	金	銅	銅	銅	銅	銅					
轡	左												

* 天子車文畫輓據《晉書·輿服志》

** 五末·據徐廣云指轅、兩轂頭及衡端。

表中車飾或圖案不同表現在車的各部構件中，關於車各部的構件名稱何指，研究者甚多，這裡不贅述（可參考圖一）⁶⁹。表中制度可與考古發現相參證，如秦陵一號銅車及二號銅車馬，兩輪牙的內側與左右兩側塗朱色，輻亦局部塗朱，轂、軸亦然。⁷⁰。大葆台漢墓（漢元帝時廣陽頃王墓）出土的三輛「王青蓋車」，周身塗黑漆，輪牙兩側的一半、及容輻的一面塗紅漆，使輪牙紅黑各半，輻條兩端亦塗紅漆，轂彩繪鋸齒文。⁷¹這些就是所謂的「朱輪華轂」，漢人往往以「朱輪」為高官的代稱。⁷²武威磨咀子發現的西漢末年墓中（M48）其銅車馬（明器）合乎上表皂繒蓋、銅五末、朱一輓等千石官員的規定，不過其杠（車蓋柄）黑色、塗朱之輓

69 參考袁仲一、程學華前揭文；楊英杰，〈先秦古車挽馬部分鞍具與馬飾考辨〉；林巳奈夫，《漢代の文物》，頁297-357及圖版頁131-149。孫機，〈始皇陵二號銅車馬對車制研究的新啟示〉。

70 見袁仲一、程學華前揭文，頁5；陝西省秦俑考古隊，〈秦始皇陵一號銅車馬清理簡報〉。

71 前揭《北京大葆台漢墓》，頁75-77。

72 《漢書》卷三六〈劉向傳〉：「今王氏一姓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，青紫貂蟬充盈幄內。」，楊惲家盛時，「乘朱輪者十人」（同書卷六六〈楊惲傳〉）。《續漢志》卷二九〈輿服上〉，頁3648，劉昭注引《古今注》：「武帝天漢四年，令諸侯王大國朱輪，……小國朱畫輪，……卿車者也。」

爲右轡與制不合，是否制度變遷，或因屬明器，較簡陋，或有其他原因不可知。⁷³漢畫中官吏的車許多都有四維杠衣（見圖五、七）與制相合。另外，曲阜九龍山魯王墓、安徽六安的西漢大型墓之隨葬馬車（真車，非明器）均有銅衡筭，⁷⁴這些都說明輿服制度仍有相當作用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這套制度層階分明。首先，官吏的車制明顯的分成幾個階層：皇室、公卿、二千石、千石至六百石、四百石至三百石、二百石以下等數層。其中六百石爲一大分界點，六百石始得有轡，其上的被稱爲「轡車以上」。轡即車耳，車輿兩側向外反卷者，可輶輪泥並作扶手。（見圖五之四及圖七）⁷⁵轡車以上始得有吉陽筭及銅五末，這與六百石以上被稱爲長吏相符合。揚雄《太玄經》卷五〈積〉云：「君子積善至于車耳，測曰：君子積善至于蕃也。」蕃即轡，即車耳，意謂君子積善而得高位。⁷⁶漢代里語云：「仕宦不止車生耳」。⁷⁷，類似的話在漢代鏡銘中出現甚多，如青蓋鏡：「爲吏高官車生耳」，許氏鏡銘：「作吏高遷車生耳」⁷⁸皆可見車耳是身份地位的指標。其次，車飾的分別不但在於區分各級官吏，並且也在分別吏民。其中較明顯的是一般人的車杠青色，爲吏後才能用赤畫杠，吏的「四維杠衣」（可施帷裳）也是一大特徵。其他表中各種裝飾也有區別吏民的用意。如轡的始用即是鑒於吏民無別，《漢書》卷五〈景帝紀〉：

（詔）夫吏者，民之師也，車駕衣服宜稱。吏六百石以上，皆長吏也，亡度者或不吏服，出入閭里，與民亡異。令長吏二千石朱兩轡，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轡。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，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，二千石上其官屬，三輔舉不如法令者，皆上丞相御史請之。

73 甘肅省博物館，〈武威磨咀子三座漢墓發掘簡報〉。

74 參考註五一各文。

75 《漢書·景帝紀》：「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轡」，注應劭曰：「車耳反出，所以爲之藩屏，翳塵泥也。」。「轡車以上」見《續漢志》卷二九〈輿服志〉，頁3653。同卷頁3648：「轡長八尺，下屈廣八寸，上業廣尺二寸，九文，十二初，後謙一寸，若月初生，示不敢自滿也。」

76 見揚雄，〈太玄經〉（司馬光注，四部備要本），卷五，頁六。司馬光云：「小宋曰，蕃，車耳也，敷袁切。光謂車兩轡也。」

77 語見《太平御覽》卷四九六〈人事部·諺下〉，頁6引應劭《漢官儀》。

78 見羅振玉，《漢兩京以來鏡銘集錄》，頁11-12。

因此自景帝後輜即成爲常制。此外，制度規定商賈不能乘車，特加賤視，顯現社會等級的區劃。

魏晉以下車駕制度仍沿漢代的傳統，以駕畜種類及數目、車形、車飾等來分別等級，但在制度上也隨時代而有不同。茲表列如下。

表二 晉宋公侯朝車及安車⁷⁹

身 分	車 別	馬	黑 耳	後 戶	旒	旂 畫
諸 公	朝 車	4			8	降 龍
	安 車	3	有		8	降 龍
王 公 世 子	安 車	3	有		7	降 龍
特 進 至 大 將 軍	安 車	2	有			降 龍
	輅 車		施 耳	有		降 龍
郡 縣 公	安 車	2	有		8	降 龍
郡 縣 侯	安 車	2	有		7	降 龍
侯 世 子	安 車	2	有		5	降 龍
卿	安 車	1	有		5	降 龍

表三 晉至齊輅車等級⁸⁰

身 分	黑 耳	後 戶	輪
三品將軍以上、尚書令	有	有	皂
尚書僕射	無	有	皂
中書監、令	無	有	皂
四品將軍、尚書	無	無	漆轂

79 《晉書》卷二五〈輿服志〉，頁761-762。

80 《晉書》卷二五〈輿服志〉，頁763。《宋書》卷一八〈禮五〉，頁498-499。《南齊書》卷一七〈輿服志〉於引晉宋之制後云：「今猶然」（頁339），是至齊未改。

表四 晉宋牛車表⁸¹

身 分	車 別	牛	望 數	油 幢	絲 絡	交 路	輪 畫	轂 畫	幟
皇帝、太子	畫輪		4	綠	朱	青	綵漆	綵漆	無
諸王、三公	皂輪	4	4或3	青	朱絲繩		皂漆	皂漆	無
王公大臣有功	油幢		4或3	青	朱絲繩		皂漆	無漆	無
諸王三公常乘	通幟								通幟
皇帝副車	* 衣書			綠	朱	青			通幟
特賜王公	雲母	以雲母飾犢車							

* 衣書車，即御衣車、御書車等，此據《南齊書·輿服志》

表五 南齊公侯安車⁸²

身 分	馬	蓋	幡 *	耳	輪	副 車
諸王	1	青	朱		漆班	通幟車
三公	1	皂	朱		漆班	通幟牛車
國公列侯	1	皂	朱	黑		牛車
太子二傅	1		赤屏			輅車施後戶
九卿、領、護、二衛 驍游、四軍、五校	1					

* 按，此幡字當為「藩」，指屏藩，與耳不同

81 《晉書》卷二五〈輿服志〉，頁756、761；《宋書》卷一八〈禮五〉，頁497。

82 《南齊書》卷一七〈輿服志〉，頁339。

表六 南齊牛車表⁸³

身 分	車 別	幟	絡	輪	轂	校飾	牛
皇帝、太子	漆畫輪		絳系			金	1
尚書令至散騎侍郎	油絡輅						
貴臣（加禮）	四望（早輪）	通幟	油幢	班漆	班漆	銅	
貴臣（加禮）	三望車	通幟	油幢	班漆	班漆	銅	
王公（加禮）	油幢絡	通幟	油幢	班漆	班漆	銅	
王公諸王	平乘車	通幟				銅	
庶人	平乘車	無					

表七 梁輅車牛車表⁸⁴

身 分	車 別	駕 畜	耳	後 戶	輦	轂	油 幢	絡
二千石四品 以上及列侯	輅車	牛			黑	黑	青	朱絲
三公、開府 尚書令	鹿幡輅	牛	施耳	有	早			
尚書僕射侍 中光祿大夫 中書監令 秘書監	鳳幡輅	牛		有	早			
領、護、國 子祭酒、太 子詹事、尚 書、侍中、 列卿、散常	聊泥輅	牛		無	漆			
車騎、驃騎 諸王除刺史 帶將軍	龍雀輅	牛						
御史中丞	方蓋輅	牛						
** 畫輪車、早輪車、通幟平乘車制同齊。								

83 同前註。

84 《隋書》卷一〇（禮儀五），頁192-193。

表八 北魏天興車制⁸⁵

身 分	車 別	馬	車 廂	輦	輪	轂	蓋	旂
皇帝*	輦輅			龍輦 16	朱斑	繡	圓蓋華蟲	12
太子皇子	鸞輅	4		龍輦	朱	繡	綵蓋朱裡	9
太子皇子	輅車 (副)	1	緋漆				紫蓋朱裡	9
公	安車	3	緋漆	畫輦			紫蓋朱裡	8
公	輅車 (副)	1	緋漆	畫輦			紫蓋朱裡	8
侯	安車	2	緋漆	畫輦			紫蓋青裡	7
侯	(副)		緋漆	畫輦			紫蓋青裡	7
子	安車	1	緋漆				皂蓋青裡	6
子	(副)	1	緋漆				皂蓋青裡	
* 皇帝車輅甚多，這裡以輦輅為代表。								

表九 北魏熙平車制 (北齊沿之)⁸⁶

身 分	車 別	駕 畜	蓋、屋	扇	塗 飾
皇帝	五輅	馬 5			
皇太子	金輅	馬 4	朱蓋赤質		
三公、王	高車	馬 3	朱屋青表		
庶姓王侯、尚書令僕至列卿	輅車 或四望通輅	馬 1 牛 1			
正從一品、儀同、親公主	油色朱絡網	牛			金銀
二品、三品	卷通輅車	牛			金
四品至七品	偏輅車	牛			銅
王、庶姓王、儀同已上、 親公主			紫傘	雉尾	
皇宗及三品以上			青傘朱裡		
三品下及士人			青傘碧裡		

85 《魏書》卷一〇八之四，〈禮志四〉，頁2811-2813。

86 《隋書》卷一〇〈禮儀五〉，頁195-196。

表十 北周輅制⁸⁷

身 分	馬	輅	轡	輿 廣	輪 高	轂輪輅衡	箱畫	軾	較
君	4	3	6	6.6尺	7	畫雲牙	虞文雜獸	伏獸	倚鹿
卿大夫	3	2	5	6.2	6.6	轂畫雲牙	虞文雲華		倚鹿
士	2	1	4			不畫	不畫	不畫	不畫
** 輅 數：皇帝、后12，諸公9，侯8，伯7，子6，男5，三公9，三孤8， 六卿7，上大夫6，中大夫5，下大夫4，士3。 此外，當盧、鞶纓、旌、旒皆有規定，從略。									

表十一 隋大業元年車制（輅）⁸⁸

身 分	質	車 別	馬	馭 士	飾	輪	輿 箱	幢蓋
皇帝	青	玉 輅	6	28人	玉	朱斑重牙	重箱盤輿	青蓋黃裡
皇太子	赤	金 輅	4	20	金	朱斑重牙	重箱盤輿	朱蓋黃裡
皇嫡孫	綠	金 輅	4	18	金		去盤輿重轂	
親王	赤	金 輅	4	18	金		去盤輿重轂	
三品	朱	革 輅	4	16	革			
四品方伯	赤	木 輅	4	14	漆			

表十二 隋大業元年車制（安車輅車）

身 分	車 別	馬	飾	輪	輿 箱	幢蓋	通 幟	絡 網
皇帝	安 車	4	金	畫輪	重輿曲壁	紫油幢絳裡	有	朱絲
皇太子	安 車	4	金	斑輪			有	朱絲
王侯、五品	輅 車	2					青	
司隸刺史及 縣令、詔 使品六七	輅 車	1						

87 同上，頁196-199。

88 表十一至十三見《隋書》卷一〇（禮儀五），頁204-212。

表十三 隋大業元年車制（牛車）

身 分	車 別	牛	飾	蓋	幟	絡 網
皇帝	四 望	1	金	青油幢朱裡	紫通幟	紫絲
皇帝	屬 車	1	金		紫通幟	朱絲
九嬪	嬪 車	1	金		青通幟	朱絲
太子	四 望	1	金	綠由幢	青通幟	朱絲
太子妃	嬪 車	1	金		紫通幟	朱絡網
良娣以下	嬪 車	1			青幟朱裡	
三公至三品 *	嬪 車	1	白 銅		青幟朱裡	
五品以上 *	嬪 車	1	白 銅		紺幟碧裡	
六品以下 **	嬪 車	1			不許施幟	
* 有慘及弔喪則不張幟而乘鐵裝車。 ** 五品以上皆給嬪車，六品以下不給，任自乘。						

車制中皇帝、皇后、皇太子等車制最為繁複，但大體陳陳相因，北魏王延業指出：「案周、秦、漢、晉車輿儀式，互見圖書，雖名號小異，其大較略相依擬。」⁸⁹以上表中南朝各朝未詳列者以此。這裡不打算詳細討論皇帝車制本身的變化，而將重點放在各階層間的差異上，以彰顯其「列等威」的作用。

以上各表有幾點可以看出車制的變遷。首先，車制南北略有不同。南朝車制主要沿襲秦漢舊制漸有變化。例如在分別等級的車構件中，南朝特別重視是否有耳（轡）及後戶，並以黑耳後戶為地位象徵。這仍是漢代重視車耳的傳統（漢代公侯黑耳）。後戶也是漢末之制，為南朝所沿襲⁹⁰，而北朝則不重視車耳後戶。北朝在車制上有較大的變化，列如北魏之制，皇帝車駕中曾出現十六轡之車（表八），甚至有駕二十四馬的乾象輦、二十牛的大樓輦等奇製⁹¹；北周據周禮所定輅制，以輅數多少為階級之分，又強調轡數、輪高的等級；隋以馭士人數分等級，這些都不見於漢晉南朝。

89 引見《魏書》卷一〇八之四，〈禮志四〉，頁2814-2815。

90 參尚秉和，《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》，卷九，〈漢末車有後戶旁戶為西漢所未有〉條，頁143。

91 見《隋書》卷一〇〈禮儀五〉，頁200。

其次，就車類來說，也有一些變化。《傅子》曰：「漢代賤乘輅，今則貴之。」⁹²《晉書·輿服志》則指出：「輅車，古之時軍車也。……漢世貴輅輶而賤輅車，魏晉重輅車而賤輅輶。」《宋書·禮志五》也說：「輶車，輶車之流也。……漢代賤輅車而貴輅輶，魏晉賤輅輶而貴輅車。」輅車在漢代是貴賤通乘，魏晉以下則是高官者所乘，一般不得乘。晉齊尚書以上給輅，梁御史中丞以上給輅（表五、表七），石季龍規定「散騎常侍以上得乘輅」⁹³皆可見乘輅者地位之高。宋孝武時，江夏王義恭表改車服，令「車輿不得油幢，輅車不在其限。」⁹⁴油幢是區分地位的重要配備（見上列各表），反映了乘輅者的地位。

相對的，輅輶車漸賤。漢代輅輶地位甚高，原非一般人所得乘，漢代王侯夫人，「出有輅輶之飾」⁹⁵楚王英被廢，仍賜「得乘輅輶」，⁹⁶上文曾引桓榮為少傅，特賜輅車皆是。然而魏晉何以轉賤輅輶呢？這要從牛車的興起來瞭解。上引《宋書·禮志》論賤輅輶是在敘述「輶車，輶車之流也」後，可知其意指。漢末以下牛車興起成為常乘，馬車漸少，無論輅車、輅輶都轉以牛駕（見下文）。東漢劉熙在《釋名·釋車》中云：「輶車，輶，屏也，四面屏蔽，婦人所乘牛車也。」將輶車釋為牛車，可說反映了當時的實情。民間牛車原即是有棚的車，載物兼載人，是輅輶類車，魏晉上層階級之牛車或以輅為輿、或張幟以表彰身分，相對之下，民間所得乘的原來輅輶形式之車遂被賤視。

牛車興起，成為車駕制度的另一系統，確是車駕制度的一大變化。表四可見晉以下，皇帝的車駕中即有許多牛車，如畫輪車，「駕牛，以綵漆畫輪轂。上起四夾杖，左右開四望，綠油幢，朱絲絡，青交路，其上形制事事如輦，下猶輶車耳。」又有御衣車、御書車、御輅車、御藥車、陽遂四望總窗卑輪小形車，皆駕牛。皇后、皇太子非法駕則乘畫輪車，王公有勲德的可乘雲母車、皂輪車、油幢車、通幟車，都是牛車。而輅車也漸以牛，晉皇帝的御輅車是其例。又《宋書·禮

92 見《史記》卷三〇〈平準書〉，頁1430-1431，《索隱》引《傅子》。

93 見《晉書》卷一〇六〈石季龍上〉，頁2763。

94 見《宋書》卷一八〈禮五〉，頁521-522。同書卷六一〈江夏王義恭傳〉：「車非輅車，不得油幢。」

95 《後漢書》卷一四〈齊武王縯傳〉，頁553-554。

96 《後漢書》卷四二〈楚王英傳〉，頁1429。

五》：「追鋒車，去小平蓋，加通縵，如輅車，而駕馬。」云如輅而駕馬，可見此輅指牛車，南齊諸車中，油絡輅即駕一牛。（表六）到了梁，所有的輅車都已是牛車了（表七）。北朝迄隋，輅車雖仍為馬，但另有牛車制。（表九、表十三）大體而言，牛車在車駕制度中的作用，一是作為正式儀式中的副車，如南齊公侯安車之副車已全是牛車（表五），又隋皇帝屬車八十一兩，全是牛車（秦漢皇帝屬車八十一兩皆馬車）皆是；一是作為日常上朝、出外所乘，如南齊的油絡輅車，是尚書令、僕射、中書監令、尚書、侍中、常侍、中黃門、中書、散騎侍郎朝直所乘⁹⁷，可見已漸取代馬車。

關於牛車的應用，及其興起的原因，將於第六節討論。需要說明的是，牛車用以劃分等級的與馬車有別。如以「望」（窗子）的多少劃分高低。「油幢」（幢，車帷幕）也是一個重要的分別。而是否有「幟」，更是重要的分界。《釋名·釋車》：「幟，憲也，禦熱也。」幟是在牛車上更張一大帳，用於禦熱。幟有通幟、偏幟、卷通幟等區別。《晉書·輿服志》：「通幟車，駕牛，猶如今犢車制，但舉其幟通覆車上也。」（圖二〇、二一）偏幟車是只在車前面張幟，（圖二二），卷通幟車幟卷曲。（圖二六）晉宋王公始得通幟，南齊通幟者亦王公貴臣，庶人牛車無幟；（見上各表）北魏、北齊卿以上四望通幟，二、三品乘卷通幟車，四品到七品可乘偏幟車，八品以下無幟；隋原規定五品以上乘偏幟，後嫌其不美，從王公到五品，一律改成通幟，只以材料及顏色分別貴賤，六品以下不得張幟（表十三）。「油幢」與「幟」本是牛車之制，發展到北朝後期迄隋，連馬車也用以標誌身分。（表十二）⁹⁸。

綜觀上述，車駕制度所分別的等級，其重點明顯的放在官僚階級，以標榜其身分，其中以六品為一大界限（魏、北齊以七品），（表九、十三）⁹⁹庶人更是不能有這些車飾。不過關於士庶良賤在車制上的區別，其直接的史料不多，這點將

97 《隋書》卷一〇〈禮儀五〉，頁209。《南齊書》卷一七〈輿服志〉，頁339。

98 王今棟，《中國古代車馬》，頁132錄有北朝敦煌壁畫之張幟馬車。見本文附圖二四。

99 按張鵬一，《晉令輯存》七〈服制令〉：「安車，紫油通幟，紫油纁朱裡，四望車，清（青）油通幟，清油纁，並朱纁絡網。……諸車，一品清油纁，道（通）幟，朱裡，朱絲絡網。三品以上清（青）道（通）幟朱，五品以上，青偏幟，碧裡。六品以下，皆不得用。」張氏引自《御覽》，不言何代，唯觀其內容，不應為晉令，而與隋之規定符合，當為北朝之制。

在第五節討論，此處不贅。

四、車駕行列

車的規制反映身份，而車隊更是身份地位的象徵，古代的統治者出有車馬之飾，其巡狩、出行除了具有鎮撫、統治的意味外，也藉著儀仗隊伍的喧赫場面、華麗裝飾宣示其政治社會地位。因此對車騎行列制度極為重視。先秦有爵者自大夫以上都有「貳車」（副車），《禮記·少儀》：「貳車者，諸侯七乘，上大夫五乘，下大夫三乘。」¹⁰⁰，燕昭王賜樂毅「輅車、乘馬、後屬百兩。」¹⁰¹即其例。春秋戰國諸子也都車從衆多，「表威」是其一因。¹⁰²秦統一天下之後，「兼其車服」，統合諸侯後車之制，屬車竟有八十一乘，又有五時安車、立車（上文所引秦陵銅車馬，據考即為五時安、立車之模型），在不斷的巡行中又建立了警蹕、前驅、參乘等制度，為後世所沿襲。¹⁰³

秦漢皇帝有「三駕」，即大駕、法駕及小駕，《獨斷》云：

天子出，車駕次第謂之鹵簿，有大駕、有小駕、有法駕。大駕則公卿奉引，大將軍參乘，太僕御，屬車八十一乘，備千乘萬騎。……中興以來不常用，先帝時，特備大駕上原陵，他不常用，唯遭大喪乃施之。法駕，公卿不在鹵簿中，唯河南尹、執金吾、洛陽令奉引，侍中參乘，奉車郎御，屬車三十六乘。北郊、明堂，則省諸副車。小駕，祠宗廟用之。每出，太僕奉駕上鹵簿于尚書，侍中、中常侍、侍御史主者、郎令史皆執注以督整諸軍車騎。春秋上陵，令又省于小駕，直事尚書一人，從令以下先行。

這段文字大體為司馬彪《續漢志》卷二九〈輿服志〉所沿襲。根據他們的說法，三駕是用於不同的場合，車數、負責人、及排場各不同。大駕是備「千乘萬騎」，在

100 各級貳車之數，古書中有不同的說法，詳見陳槃，〈春秋列國的交通〉頁916，註一一。

101 董說，《七國考》，卷八〈燕器服〉，頁263。

102 參考尚秉和，《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》卷八〈周末貴人車從之多因是證明數事〉條，頁133。

103 見馬非百，《秦集史》，頁506—508。王學理，〈五時副車銅偶所反映的秦代鑾駕制度〉，收於前揭《秦陵二號銅車馬》。

皇帝死時用。法駕稍次，但場面亦不小。由河南尹、執金吾、洛陽令牽引，奉車郎御，侍中參乘，屬車三十六乘，前驅有九旂雲罕，鳳凰闔戟，皮軒鸞旗，後有金鉞黃鉞，黃門鼓車。接著是屬車，由尚書、御史所載。屬車之末車懸豹尾，豹尾前比「省中」。法駕用於祠天、郊等祭祀。祀地、明堂省什三，祠宗廟尤省，即是小駕。¹⁰⁴

漢代三駕制度的記載不多，但此制為歷代所沿襲，我們尚可於《晉書·輿服志》中的「中朝大駕鹵簿」見其大略。《晉書》對大駕各鹵簿人數有詳細記載，總觀整個車隊，包括了奉迎者、驂乘者、旗車、黃鉞車、鼓車、屬車、騎兵、步卒、戟吏、夾輿人（中黃門）、清道者（式道侯）、鼓吹（樂隊）、各式車輛（象車、武剛、九旂、雲罕等）以及河南尹、洛陽令、朝廷各官屬及其導從，所謂「千乘萬騎」，並非虛語。

前引《獨斷》指出漢代天子車駕次第稱為鹵簿，《漢官儀》中也有同樣的說法。鹵（同櫓）是大楯，鹵簿指天子出行時之儀衛導從。¹⁰⁵然而天子以下的官吏也都有儀衛導從，茲表列漢代制度如下：¹⁰⁶

104 以上見《獨斷》，頁二七。

105 見應劭，《漢官儀》卷下，頁七。按唐封演《封氏聞見記》五：「輿駕行幸，羽儀導從謂之鹵簿。……按字書：『鹵，大楯也』……甲楯有先後部伍之次，皆著之簿籍，故謂之鹵簿耳。」

106 《續漢志》卷二九〈輿服志〉。

表十四 車騎行列等級（東漢）

身 分	騎吏	導車	從車	導斧車	前後并馬立乘	前後兵車	亭長	璽弩車前伍伯	辟車	其他
諸侯王	4	傅相以下		?	?	?	?	?	?	有
列侯	4	家丞庶子		?	?	?	?	?	?	有
公	4	3	2	1	有			8		有
二千石	4	3	2	1						
千石	2	3	2	1				4		有
長安洛陽令	2	3	2	1				有		有
王國都縣令	2	3	2	1				4		有
六百石	2	3	2	1				4		有
四百石	2	3	2					2		有
三百石縣長	2	3	2					2		有
二百石								2		有
大使（持節）	?	6	4	2				12		4
大使（無節）	?	3	2	1	6	2	?			
小使	?	3	2	無						?
近小使	從騶騎 40 人									
說明 1.騎吏帶劍、持檠戟，三導車指賊曹、功曹、督盜賊，兩從車主簿、主記。 2.其他一項包括鈴下、侍閤、門闌、部署、街里卒等。										

上表中，導從車方面，三百石以上車數並無不同，但騎吏、伍伯、亭長數有別，所乘車也不同（見前節）。而縣令（六百石）以上始有像徵權力的導斧車（圖八、九），顯示六百石為一大界線，與上節車形之分劃相合。這種前導後從的出行隊伍表現在漢畫與畫像磚中甚多。以畫像磚論，據王愷估計蘇、魯、皖、豫交界地區的四十座漢畫象墓中，三分之一都刻有車馬出行圖。¹⁰⁷四川德陽出土之伍

107 王愷，〈蘇魯豫皖交界地區漢畫像石墓的分期〉。

伯畫象磚，畫四人，二人荷長矛，一手執刀，鳴聲開道，後二人手持檠戟，健步飛奔。郫縣出土的「伍伯前驅畫像磚」，包括四伍伯，兩騎吏，另兩人迎車（據上表為六百石至千石之制）。¹⁰⁸成都市郊出土的「斧車」畫像磚，一車無蓋，中樹一斧，兩旁各斜插一羽飾長矛，車兩側各有一橫扛旌旗者，¹⁰⁹皆可與上表相印證。在壁畫中的更為清楚。例如望都漢墓有辟車五伯八人，密縣打虎亭的壁畫兩輛輜車各有從騎五人。¹¹⁰河南偃師墓出土車騎出行圖，共九乘安車，七十餘個人物，五十餘匹馬，最前是徒步而行，手持旌旄的兩列人，接著騎吏八人，馬后一卒護衛一帶傘之安車，後六名騎吏一步卒衛第二乘安車，第三乘前騎吏九人，伍伯兩人。第四乘為墓主人安車，前後騎吏十二人，車前伍伯六人，車有四維及幡，彩飾蓋斗，後又有五輛安車，十名單騎，當為屬吏或眷屬¹¹¹。和林格爾之東漢護烏桓校尉墓（二千石）之巨幅出行圖，有車十乘，馬一二九匹，屬吏、侍僕、兵卒一二八人。車騎分三行，左翼五騎為首為「雁門長史」，右六騎，中擁前後兩車，題「校尉（行部）」，接著為兩排導騎，接兩導車，白蓋，導車之後在兩邊眾多的車馬擁護中，又有兩黑輜車，皆兩馬，書「功曹眾事」「別駕眾事」，又有許多從騎。從騎後有前衛七騎之主車，書「使持節護烏桓校尉」，為立乘、黑蓋、施耳之輜車，車後有赤節，駕三黑馬，還有許多車從。¹¹²

漢墓中的這類圖像，其用途為何？其中一部份圖形曾被指為與送葬隊伍有關，但這類只是一小部份，且尚有爭論，¹¹³絕大部分還是用以像徵其生前身份地位，或記其生前經歷。畫像石或壁畫來自畫工，有一定的格套，也不無誇大墓主地位或逾制、或不及之處，自然無法直接作為墓主身分的證據。¹¹⁴不過就圖像本

108 劉志遠、余德章、劉文杰，《四川漢代畫象磚與漢代社會》，頁11-13。

109 高文，《四川漢代畫像磚》，圖七五。

110 參考北京歷史博物館、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編，《望都漢墓壁畫》，頁13。安金槐、王與剛，〈密縣打虎亭漢代畫像墓和壁畫墓〉。

111 參考洛陽古墓博物館，《洛陽古墓博物館》，頁20-21。

112 內蒙古文物工作隊、內蒙古博物館，〈和林格爾發現一座重要的東漢壁畫墓〉。

113 《南陽漢代畫像石》（南陽漢代畫像石編輯委員會編，）第224幅為出行圖，三輛輜車前有三騎，各扛一長條形、下有分岔的旗幟，釋者謂為分別死者的「銘旌」，若然，則此類出行圖當為送葬圖，但同書第5、6圖僅稱之為「幡」，尚有待研究。

114 邢義田，〈漢代壁畫的發展和壁畫墓〉（收於所著《秦漢史論稿》），頁472-480。吳曾德，〈漢代的車騎出行〉。

身而言，無疑的是有制度的根據。李發林研究漢代山東畫像石，發現與制度大體相合；¹¹⁵林巳奈夫比對畫像石中車馬的配置與制度的異同，也得到同樣的結論。¹¹⁶從實際的例子來看，如前面提到的偃師出行圖，其第四輛車為主車，合乎一般前三導車的規定，山東嘉祥紙坊畫像石第五石，前三輛為導車，第四輛為有交絡的主車，後有二從車，與三導二從的制度完全符合。¹¹⁷值得注意的是，許多畫也標明是描寫墓主生前車騎。如武梁祠石刻上有「為督郵時」、「君為郡□時」；魯峻刻石上有「為九江太守時」；和林格爾墓上有從「舉孝廉時」到「使持等護烏桓校尉」各階段的車馬行列，雖然其駕三馬之車，與制度中持節的駟馬「大使車」不同，但其黑蓋、施耳諸制與規定相同。公元151年蒼山墓的出行圖，前有迎者和二導騎，其後有輜車兩輛，又有斧車一輛，再後為一騎吏和輜車，在「墓志」中有「君出行，車馬導，從騎吏，留都督在前，後賊曹」的記載為其圖作了註解。¹¹⁸孝堂山石祠畫像的車馬出行圖，（圖一一）共一百一十五人，根據其車隊排列、特殊的車子（如鼓車）及其「相」「大王車」等題榜，學者考證與諸侯王出行從其傅、相的制度相合。¹¹⁹這些例子說明了出行圖之類的圖畫仍有相當根據。

最近發表的安平東漢壁畫墓，為車駕制度提供了豐富的資料，可以看出制度與實際的異同。墓有熹平五年紀年，墓主疑為當地宦官趙忠一族（墓磚有「趙」字）。大墓中室的四壁，以黃色格線上下分為四層，每層四壁相連，各是一幅完整的車馬出行圖。這四幅圖共有車八十二輛，駕、乘者164人，步行者96人，騎吏94人，駕、騎的馬合計179匹，車馬人物之多尤過和林格爾壁畫。考釋者認為四幅出行圖可能代表墓主任高官的四次升遷，但都與二千石以上官吏的情況大體相合。例如各層圖之主車前都有辟車四人，上三層圖璫弩伍伯前又各有騎吏四人，都與二千石以上之制相合。再以車的配置來說，其基本配置順序為：¹²⁰

持棨戟伍伯2人——門下賊曹白蓋車——斧車——門下督盜賊白蓋車——

115 李發林，《山東漢畫像石研究》，頁28-29。

116 林巳奈夫，〈後漢時代の車馬行列〉，頁183-226。

117 嘉祥縣文管所，〈山東嘉祥紙坊畫像石墓〉，頁33。

118 王愷，前揭文，頁53-54。

119 夏超雄，〈孝堂山石祠畫像、年代及主人試探〉。

120 以上參考河北省文物研究所，《安平東漢壁畫墓》，頁13-24。

持檠戟伍伯2人——門下功曹白蓋車——持檠戟伍伯2人——

持檠戟騎吏4人——車前璫弓伍伯6人——辟車4人——主車——騎吏8人——

門下主簿白蓋車——門下主記白蓋車——持檠戟伍伯2人

這個配置前後各以二持檠伍伯與其他車輛分開，其順序基本上與上表中斧車及門下五吏（三導二從）的制度相合。五吏之白蓋車與其二百石以下之身分符合，而主車所乘的皂繒蓋纓絡朱幡車，也合乎制度。但也有些與制未盡合的地方，例如其主車之杠與輪皆黑色，與制之朱輪赤杠不同，而其車前璫弓伍伯六人，介於二千石之四人與公之八人間，是否為僭越逾制，或實有此一級（例如卿一級）？記載缺略，已不可知。

漢墓中大量出現這類車馬出行圖，意在誇耀其生前身份地位，所謂「人以輿服為榮」也。這在實際社會中如宣帝時，黃霸被命為潁川太守，「賜車蓋，特高一丈，別駕主簿車，緹油屏泥於軾前，以章有德。」¹²¹王莽為宰衡，位上公，「出從期門二十人，羽林三十人。前後大車十乘。」直事尚書郎、侍御史、謁者、中黃門等都隨行。¹²²諸官署中如執金吾，車騎最盛，《漢官》曰：「執金吾緹騎二百人，持戟五百二十人，輿服導衆，光滿道路，群僚之中，斯最壯矣。世祖嘆曰：『仕宦當作執金吾』」¹²³漢末邊郡長吏車從亦衆。士燮在交州，兄弟並為列郡，雄長一州，「出入鳴鐘磬，備具威儀，笳簫鼓吹，車騎滿道，胡人夾轂焚燒香者常有數十，妻妾乘輜輶，子弟從兵騎，」。¹²⁴都可看出以車騎自誇之風。

三國以下的車騎出行制度，史志中缺乏像《續漢志》那樣等級分明的記載（如《晉書·輿服志》中所載規定，許多是抄襲漢代，不能視為當時制度）。不過，從零星的資料中，也有幾點值得注意。首先，車騎鹵簿仍極重視。當時「鹵簿」一詞並非如蔡邕、應劭所說專指皇帝車駕次第，王公大臣之儀從也叫鹵簿。如晉太尉賈充向夏統炫耀其文武鹵簿，八王亂時寧朔將軍王浚欲與幽州刺史和演合鹵簿皆是¹²⁵。宋世顏延之好乘羸牛笨車，其子顏竣為中書令，延之逢竣鹵簿，即屏往

121 《漢書》卷八九〈黃霸傳〉，頁3629。

122 以上見《漢書》卷九九上〈王莽傳〉，頁4068。

123 《續漢志》卷二七〈百官志〉，頁3606劉昭注引。

124 《三國志》卷四九〈士燮傳〉，頁1192。

125 《晉書》卷九四〈夏統傳〉，頁2429-2430；同書卷三九〈王浚傳〉，頁1146-1147。

道側；齊永明八年大水，散騎常侍虞棕朱衣乘車鹵簿，於宣陽門外行馬內驅逐人，被劾；梁世呂僧珍爲本州刺史，常導從鹵簿到其姊之宅，亦皆其例。¹²⁶根據記載，有鹵簿者之範圍甚廣，諸侯王、公卿、侍中、刺史下及縣令都可有¹²⁷。這個範圍基本上與漢代有導從者相當。百官的鹵簿中，御史中丞與中尉的威勢最盛。《南齊書》卷一六〈百官志〉：

（中丞）專道而行，騶輻禁呵，加以聲色，……宋孝建二年制，中丞與尚書令分道，雖丞郎下朝相值，亦得斷之，餘內外衆官，皆受停駐。

梁朝王僧孺幼年隨母入市，遇中丞鹵簿，被驅迫溝中，及自任中丞，拜官日引騶清道，悲不自勝。¹²⁸《北齊書·琅玕王儼傳》亦載中丞與皇太子分道，其出行，「王公皆遙住車，去牛，頓軛於地，以待中丞過。」皆可見中丞聲勢。北魏之〈御史令〉云：「中尉出行，車輛前驅，除道一里，百辟避路。」¹²⁹大約因爲中丞與中尉督司百僚，故鹵簿較盛。

出行導從人數，皇帝固然是「萬騎天行，千乘電動。」¹³⁰，諸侯王導從亦多。宋孝武間爲限制諸王，規定：「諸鎮常行，車前後不得過六隊，白直夾轂，不在其限。」南齊豫章王嶷自言：出行省去儀刀及捉刀（捉刀十餘人），身所牽仗有二俠轂、二白直，共七八十人，在邊境時則有三百人。三公如陳顯達爲太尉，「車乘朽敗，導從鹵簿，皆用羸小，不過十數人。」這是「深自貶匿」的結果，應不只此數。《北齊書》載文宣備三公鹵簿待陸法和，給通轆油絡網車，仗身百人。¹³¹一般官吏出行鹵簿，車前有導騶，猶如漢車前伍伯，負責清道。《南史·王僧祐

126 《宋書》卷七三〈顏延之傳〉，頁1903-1904；《南齊書》卷三七〈虞棕傳〉，頁655；《梁書》卷一一〈呂僧珍傳〉，頁213。

127 諸侯王見〈陳書〉卷二八〈長沙王叔堅〉，頁366-367。公卿如陳顯達，見《南齊書》卷二六〈陳顯達傳〉，頁491；刺史見註一二五及《北齊書》卷二三〈崔陵傳〉頁334；《周書》卷三二〈陸通傳〉頁560；縣令鹵簿見《南齊書》卷四二〈蕭誕傳〉，頁747。至於《梁書·朱异傳》說他「自右衛率至領軍，四職並驅鹵簿，近代未之有也。」並非說其他官沒有鹵簿，而是指此四官皆主皇帝之鹵簿言。

128 《梁書》卷三三〈王僧孺傳〉，頁470-471。

129 《魏書》卷一四〈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〉，頁353。

130 見簡文帝，〈南郊頌〉，收於《全梁文》卷一二，頁8。

131 《宋書》卷一八〈禮志五〉，頁521-522。《南齊書》卷二二〈豫章文獻王嶷〉，頁410-411；同書卷二六〈陳顯達傳〉，頁491。《北齊書》卷三二〈陸法和傳〉頁430-431。

傳》：「雅爲從兄儉所重，每鳴笳列騶到其門侯之。」《北齊書·畢義雲傳》：「鳴騶清路，盛列羽儀」。騶的人數，似仍守漢代傳統。上文曾引南齊王融之言：「車中乃可無七尺，車前豈可乏八騶。」《南齊書》卷四七〈王融傳〉：

融自恃人地，三十內望爲公輔。直中書省，夜歎曰：「鄧禹笑人。」行逢大開，渲湫不得進。又歎曰：「車前無八騶卒，何得稱爲丈夫！」

王融冀至公位，故云八騶，此與漢代公之璽駟車前伍伯八人相合。《南齊書》卷四二〈蕭誕傳〉云：

永明中爲建康令，與秣陵令司馬迪之同乘行，車前導四卒，左丞沈昭略奏：「凡有鹵簿官，共乘不得兼列騶寺，請免誕等官。」詔贖論。

兩令導四卒，則一人兩卒，亦與漢略同。其餘可考的有尚書左右丞、治書侍御史，車前皆三騶。¹³²

晉隋間的出行儀仗，與漢代也有不同的地方。隨行的夾轂、白直等隊伍，不見於漢代¹³³，隊伍又多有鼓吹¹³⁴，更重要的是，漢代的導車與從車都漸消失，而馬車的行列，成爲以牛車爲主的形態，這在墓葬中也有反映¹³⁵。這種變遷中，牛車取代馬車留待後論，其餘的隨從隊伍則與軍隊形態的改變有關。基本上，用以導從儀衛的本是軍隊，漢代沿襲古代車戰的傳統，戰車仍甚重要，所以用戰車、斧車以象徵權力。但車戰在戰爭中的地位已在減退之中，魏晉以後，南方習水

132 《梁書》卷五〇〈謝幾卿傳〉：「停車褰幔，與車前三騶對飲。」同卷〈何思澄傳〉：「遷治書侍御史，宋齊以來，此職稍輕，天監初始重其選，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，執盛印青囊，……」是則治書侍御史在天監前可能非三騶。

133 夾轂是護衛於車旁的部伍，是特別挑選出來的精銳。如王敬則以善跳刀補俠轂隊主。（《南齊書》卷二六〈王敬則傳〉，頁49。）白直則專供使役，《隋書》卷二七〈百官志中〉提及北齊官制：「自州、郡、縣，各因其大小置白直，以供其役。（頁763）」

134 六朝鹵簿高者多有鼓吹，《宋書·樂志一》：「應劭漢鹵簿圖，唯有騎執箠。箠即箠，不云鼓吹。而漢世有黃門鼓吹，……魏晉世給鼓吹甚輕，牙門督將五校，悉有鼓吹。……」

135 魏晉以下墓中畫像磚已很少，壁畫墓也不多，有畫及儀仗者，多是步卒或騎士，如東魏茹茹公主墓之儀仗圖壁畫即是。（湯池，〈東魏茹茹公主墓壁畫試探〉）東晉時期的（北方約爲十六國）在遼寧的壁畫墓中的車騎圖則是以牛車爲中心。（遼寧省博物館文物隊、朝陽地區博物館文物隊、朝陽縣文化館，〈朝陽袁子台東晉壁畫墓〉。）更多的是車中無圖畫，而以陶牛車爲中心，配以騎馬、執仗、鼓吹等俑。見寧夏固原博物館，〈彭陽新集北魏墓〉。

戰，北方多騎兵，取代了車的地位，¹³⁶用以儀衛者改變，導車、從車遂逐漸消失。

整個說來，魏晉迄隋，出行鹵簿仍是身份的重要象徵，雖然由於墓葬型態的改變，像漢代畫像磚、壁畫之類的車馬行列圖在墓葬中已漸消失，但形諸圖卷者仍有不少。張彥遠在《歷代名畫記》三〈述古之秘畫珍圖〉云：「諸鹵簿圖，不備錄，篇目至多。」又有「大駕鹵簿圖」，這兩條列在曹魏時畫前後，應是魏晉作品。¹³⁷《宋書》卷五一〈宗室傳〉：

（劉）韞人才凡鄙，以有宣城之勳，特爲太宗所寵。在湘州及雍州，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，常自披玩。嘗以此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，興宗戲之，陽若不解畫者，指韞形象問曰：「此何人而在輦上？」韞曰：「此正是我。」其庸鄙如此。

可見以鹵簿自誇的情形。這類圖卷直至唐代都可看到¹³⁸，誇耀儀仗之習相沿甚久，只是唐以下圖中以馬、肩輿爲主，車已不如前重要了。

五、科品與逾制

從以上對車的形制、車馬行列制度的討論中，可以看出車駕制度的具體內容及其變遷，但是這些制度的作用何在？與實際情形是否相合？都值得進一步討論。首先略述歷代制定車駕科品的情形。

秦漢以下歷代都有定車服制度之舉。秦一統天下之後，改輿爲六尺，乘六馬，形成「車同軌」的局面，又制屬車八十一乘；漢景帝始制官吏車輻之制，這些都已見上文。平帝元始三年夏，王莽奏車服制度，及養生、送終、嫁娶、奴婢、田宅、器械之品；始建國元年，又法古改制，「車服黻冕，各有差品」¹³⁹，但時方動亂，到後漢初，猶未能行。到明帝時才又定制。《續漢志》卷三〇〈輿服下〉劉昭

136 參考袁庭棟、劉澤模，《中國古代戰爭》，〈車戰〉、〈騎戰〉、〈水戰〉三章，頁305-388。

137 張彥遠，《歷代名畫記》，頁46。

138 參考周一良，《魏晉南北朝史札記》，頁165-166，〈鹵簿圖〉條。

139 見《漢書》卷一二〈平帝紀〉，頁355；同書卷九九中〈王莽傳〉，頁4103-4104。

注引蔡邕〈表志〉云：

永平初，詔書下車服制度，中宮皇太子親服重繒厚練，浣已復御，率下以儉化起機，諸侯王以下至于士庶，嫁娶被服，各有秩品，當傳萬世，揚光聖德。

永平是東漢制度較嚴的時代，其提倡儉德含有壓抑諸侯王、防止反側等政治目的。永平秩品，成了東漢一代遵循的制度，到了桓帝時還加重申。¹⁴⁰此後代有改變。晉義熙時徐廣奉詔撰車服儀注；宋孝武二年，江夏王義恭及竟陵王誕上表改革諸王車服制度。¹⁴¹北朝方面，北魏孝文帝延興中，曾令李詔修改車服羽儀制度；北齊文宣帝也曾詔改吉凶車服制度，「各爲等差，具立條式，使儉而獲中。」至於北周，由蘇綽依周禮立制，後由盧辯續成「車服器用，多依古禮，革漢、魏之法。」可說有了較大的變遷。¹⁴²到了隋，承齊周之制加以改革，煬帝時，閻毗立議，對輦輅車輿多所增損。大業二年又命尚書令楊素、吏部尚書牛弘、大將軍宇文愷、內史侍郎虞世基、禮部侍郎許善心「制定輿服，始備輦輅及五時副車。…五品已上，給輦車通轡，三公、親王加油絡。……下至胥吏，服色各有差。」¹⁴³

定制的目的與作用，可分幾點討論。

第一，科品制度具有宗教性與儀式性，象徵新王朝之新時代。如秦即爲其例，王莽的車服差品也有宣告新朝的意義。此外，歷代王朝車服制度中，有一大半是偏重於皇帝之祭祀、郊天、祭祖、婚喪等禮節，其車服形制之爭議，如「輅」制，一大半集中於此。這種儀式關係政權的正當性、是否受天命等觀念。自然是定制的動機之一。又如北魏世祖眞君三年，親至道壇，從寇謙之言，備法駕，旗幟盡青，「以從道家之色也，自後諸帝繼位皆如之。」¹⁴⁴北周宣帝改元大象，自比上帝，「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爲節」，「倍前王之數」¹⁴⁵這些都含有宗教及儀式的作用，但對實際政治社會影響不大。

140 《後漢書》卷七〈桓帝紀〉，頁299。

141 《晉書》卷八二〈徐廣傳〉，頁2158；《宋書》卷一八〈禮五〉，頁521-522。

142 《北史》卷三九〈李詔傳〉，頁886；同書卷七〈齊本紀·文宣帝〉，頁245-246。《周書》卷二四〈盧辯傳〉，頁404。

143 《北史》卷六一〈閻毗傳〉，頁2184；《隋書》卷三〈煬帝〉，頁65。

144 《魏書》卷一一四〈釋老志〉，頁3053。

145 《周書》卷七〈宣帝〉，頁一二五；《北史》卷一〇〈周本記下·宣帝〉，頁375。

第二，基於嚴禁奢侈的立場。例如以上永明定制，在於「率下以儉化起機」，齊文宣時所謂「儉而獲中」皆是。李斯云：「凡古聖王，飲食有節，車器有數，宮室有度，出令造事，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，故能長久治安。」谷永也指出：「……天下乃天下之天下，非一人之天下也。王者躬行道德，……宮室車服不踰制度。」¹⁴⁶他們都認為車服制度是對統治者的一種限制，是對上而言的。然而對下而言，上之所定制，往往不在限制臣下之「奢」，尤在著眼於其「僭」。例如《史記·始皇本紀》：「始皇帝幸梁山宮，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，弗善也。」¹⁴⁷始皇之所以不善，恐不在其奢，而在其僭，政治忌諱應該是重要因素，故以車服制度來分別尊卑才是最重要的考慮。

第三，防僭越、序尊卑、別士庶。漢成帝詔云：「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，異車服以章有德，雖有其財，而無其尊，不得踰制。」因此車服制度是配合身分地位而有。當時王吉也指出：「古者衣服車馬，貴賤有章，以褒有德而別尊卑，今上下僭差，人人自制，……」強調了車制甄別尊卑的作用。¹⁴⁸東漢馬援認為馬的作用「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，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。」¹⁴⁹晉李重提到漢代何以特重車服的理由，他說：「降及漢魏，因循舊跡，王法所峻者，唯服物車器有貴賤之差，令不僭擬以亂尊卑耳。至於奴婢私產，則實皆未嘗曲爲之立限也。」宋孝武帝建元二年，有司奏言中也說：「漢有嚴律，諸侯竊服，雖親必罪，降于頃世，下僭滋甚」¹⁵⁰《北史·李彪傳》載彪上封事云：「第宅車服，自百官下至於庶人，宜爲其等制。使貴不逼賤，卑不僭高，不可以稱其侈意，用違經典。」車制中許多規定都是基於此一理由。例如前述宋江夏王義恭上疏「車輿非輶車不得油幢；平乘船皆下雨頭作露平形，不得擬象龍舟」。¹⁵¹北周宣帝甚至規定：「天下車皆渾成爲輪（按，即不得有車輻），禁天下婦人皆不得施粉黛，唯宮人得乘有輻車，加粉

146 《史記》卷八七〈李斯傳〉，頁2560—2561；《漢書》卷八五〈谷永傳〉，頁3466—3467。

147 《史記》卷六〈秦始皇本紀〉，頁257。

148 《漢書》卷一〇〈成帝紀〉，頁324—325；同書卷七二，〈王吉傳〉，頁3064—3065。

149 《後漢書》卷二四〈馬援列傳〉，頁840。

150 《晉書》卷四六〈李重傳〉，頁1310—1311；《宋書》卷一八〈禮五〉，頁521—522。

151 同註九四。

黨焉。」¹⁵²雖然極不合理，遭致民憤，但反映了貴賤等級對車制的影響。

六朝由於嚴士庶之分，更加強了等級的分劃。如晉護軍將軍羊琇乘羊車，爲劉毅所彈，詔曰：「羊車雖無制，猶非素者所服」。¹⁵³《晉書·王宏傳》載宏代爲司隸校尉：「於是檢查士庶，使車服異制。」士庶異制的具體內容不詳。不過苻堅與張祚都曾極端地規定，苻堅下令：「非命士已上，不得乘車馬於都城百里之內。金銀錦繡，工商、皂隸、婦女不得服之，犯者棄市。」北涼之張祚自署涼王，下令「禁四品以下不得衣繒帛，庶人不得畜奴婢、乘車馬」。¹⁵⁴庶人不得乘車馬的規定過嚴，其他政權似尚無此規定，但從第三節官吏車飾看來，一般人民不得以銅飾車、不得張幟、也不能有表中的其他車飾是可斷言的。至於良賤之別，也被強調，如宋即規定騎士、卒、百工不得「以銀飾器物、張帳、乘犢車」。¹⁵⁵

第四，爲維持身份與地位。這與上述抑奢侈之考慮恰相反，爲恐其「不及」，同樣是爲了甄別身份。漢代要有一定的資產才能擔任官吏，其用意之一，即在維持與其身份相符的配備。《史記·禮書》提及禮的作用，除了「防其淫侈」之外，還要「救其彫敝」。《漢書》卷五〈景帝紀〉所說：「吏者，民之師也，車駕衣服宜稱。」景帝鑒於吏出入閭里「無吏體」，爲使吏的車服能稱其位，命六百石以上以朱車轡的方式來標明身分。哀帝時黃門郎任猶等上書，認爲哀帝既尊生母爲「共皇太后」，車馬衣服就應符合「皇」的身分，不應不及。（註一五六）仲長統在《昌言》中說：¹⁵⁷

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，固宜重肉累帛，朱輪四馬。今反謂薄屋者爲高，藿食者爲清，既失天地之性，又開虛僞之名，……

因此科品的作用在於使車服符合身分，上文提及貢禹要賣田以備車馬，其因在此。

152 《北史》卷一〇〈周本紀下〉，頁380。

153 《宋書》卷一八〈禮五〉，頁501。

154 《晉書》卷一一三〈苻堅載記〉，頁2888-2889；《魏書》卷九九〈張祚傳〉，頁2196。

155 《宋書》卷一八〈禮五〉，頁518。按《太平御覽》卷七七五〈車部四〉引《晉令》：「百工不得服大絳紫、假髻真珠、瑇瑁文犀、玳瑁越疊以飾路張乘犢車。」此段文字頗多缺文，如與宋書比對，當爲「張帳、乘犢車」，是晉時已有此令。

156 《漢書》卷八六〈師丹傳〉，頁3505-3506。

157 《後漢書》卷四九〈仲長統傳〉，頁1654-1655。

以上四點中，儀式性姑且不論，僭奢與不及皆在所禁，而其實際，是否能行呢？上文提及漢之嚴制，雖親必誅，可見僭越者常被抑，實際例子中也有不少。例如漢景帝時梁孝王「車服擬於天子」被劾。武帝時淮南王「爲黃屋蓋乘輿，出入擬於天子。」宣帝時霍禹亦作乘輿輦，爲被誅罪名之一。¹⁵⁸《漢書》卷七六〈韓延壽傳〉：

延壽在東郡時，試騎士，治飾兵車，畫龍虎朱爵。延壽衣黃紉方領，駕四馬，傅總，建幢檠，植羽葆，鼓車歌車。功曹引車，皆駕四馬，載檠戟。五騎爲伍，分左右部，軍假司馬、千人持幢旁轂。歌者先居射室，望見延壽車，噉咷楚歌。延壽坐射室，騎吏持戟夾陛列立，騎士從者帶弓韃羅後。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，被甲鞬鞞居馬上，抱弩負簡。

延壽飾兵車以龍虎朱爵，植羽葆，連功曹引車也用駟馬，故以「上僭不道」罪名處死。漢武帝拜江充爲「直指繡衣使者」，禁察踰侈，貴戚近臣多被舉，充請沒收車馬，並將違者充軍，貴戚叩頭求哀，以錢自贖，得數千萬。¹⁵⁹東漢陳留太守富宗以車服侈縱被誅，¹⁶⁰董卓於郊天時乘諸侯王所乘的金華青蓋車，蔡邕直陳：「遠近以爲非宜。」卓於是改乘公卿所乘的早蓋車。¹⁶¹宋張劭鹵簿過盛，被王華所劾。南齊高帝自述殺黃回的原因：「啟請御大小二輿，吾乃不惜爲其啟開，政恐得輿，復求畫輪車。」北魏李彪被劾「坐輿省禁，輒駕乘黃……」除名。齊文襄帝下令禁斷第宇車服婚姻送葬奢僭無限者。¹⁶²，從這些例子看，僭侈之禁曾不斷被強調，不能說沒有實際作用。此外，也有不合體制而被處罰的例子。如前漢韋玄成在祀孝惠廟日，以天雨淖，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，有司奏削列侯爲關內侯；鮑宣爲豫州牧，出外乘傳行部時，去法駕（駟馬），駕一馬，舍宿鄉亭，爲郭欽所奏免官；陳遵除汝南守，以「乘藩車入閭巷」被陳崇奏免，皆其例。¹⁶³

158 《史記》卷五八〈梁孝王世家〉，頁2089；同書卷一一八〈淮南衡山列傳〉，頁3077-3078；《漢書》卷六八〈霍禹傳〉，頁2950。

159 《漢書》卷一五〈江充傳〉，頁2177

160 《後漢書》卷三三〈虞延傳〉，頁1151-1152。

161 《後漢書》卷六〇下〈蔡邕傳〉，頁2005。

162 《宋書》卷六三〈王華傳〉，頁1676；《南齊書》卷二九〈王廣之傳〉，頁547。《魏書》卷六二〈李彪傳〉，頁1391；《北史》卷六〈齊本紀〉，頁233-234。

163 《漢書》卷七三〈韋玄成傳〉，頁3110；同書卷四二〈鮑宣傳〉，頁3086；同書卷九二〈陳遵傳〉頁3711-3712。

從上述的例子中，可見科品還是有相當的作用。不過制度的實行常是與時推移。例如漢初高祖規定「賈人不得衣絲乘車」，¹⁶⁴這是賤商政策，所謂「雖有其財，而無其尊，不得逾制」。但是車是財富的象徵，商人不可能無車。武帝時，命令商賈輜車比一般人多收一倍的稅（二算），可見商人有不少輜車，而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也明白指出：「輜車百乘，牛車千兩，……亦比千乘之家。」後漢末的商賈，更是「牛馬車輿，填塞道路」¹⁶⁵可見此令推行的時間甚短。車作為一種財富象徵，具有經濟能力者皆得擁有，逾制的情形也就普遍了。

前漢以來，逾制的記載不斷。武帝時「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，屋廬車服，僭上亡限。」西漢的京師，「列侯貴人，車服僭上」，嚴安也上疏說：「今天下人民，用財侈靡，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，……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，……」大臣如辛慶忌，「性好輿馬，號為鮮明，唯是為奢。」王吉一族，「皆好車馬衣服，其自奉養極為鮮明。」¹⁶⁶富人陰氏「輿馬僕隸，比於邦君。」¹⁶⁷皆前漢著例。後漢明帝在申明科禁詔中指出：「車服制度，恣極耳目。」李固被奏「出入踰侈，輜駟曜日」。¹⁶⁸王符指出：「今京師貴戚，衣服、飲食、車輿、文飾、廬舍皆過王制，僭上甚矣。」¹⁶⁹崔寔在《政論》中提及輿服隳壞的情形：¹⁷⁰

律令雖有輿服制度，然斷之不自其源，禁之又不密，而欲絕之，……戶蹈僭奢矣。……法度既隳，輿服無限。

可見輿服制度遭嚴重破壞。當時宦官之黨「車馬服玩擬於天家」，權貴對法度也多陽奉陰違，如劉祐為司隸，為權貴所懼，「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，每至界首，輒改易輿服，隱匿財寶，威行朝廷。」類似的例子如袁紹，罷官歸汝南，車徒甚盛，將入郡界，才辭去賓客云：「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（許劭）見！」以單

164 《史記》卷三〇〈平準書〉，頁1418。

165 《後漢書》卷四九〈王符傳〉，頁1633。

166 《史記》卷三〇〈平準書〉，頁1240。《漢書》卷二八下〈地理志下〉，頁1642-1643；同書卷六四下〈嚴安傳〉，頁2809-2810；卷六九〈辛慶忌傳〉，頁2997；卷七十二〈王吉傳〉，頁3086。

167 《後漢書》卷三二〈陰興傳〉，頁1133。

168 《後漢書》卷二〈明帝紀〉，頁114-115。同書卷六三〈李固傳〉，頁2084。

169 王符，《潛夫論》（汪繼培箋本，台北，世界書局，1975），〈浮侈〉，頁54。

170 崔寔《政論》（收於嚴可均輯，《全後漢文》卷四六），頁4-5。

車歸家¹⁷¹ 曹魏以下逾制者也不少，如曹爽「飲食車服，擬於乘輿」；何曾「帷帳車服，窮極綺麗，」；阮佃夫「室宇豪麗，車服鮮明」；魚弘「玩服車馬，皆窮一時之絕。」何勗、孟靈休並以肴膳、器服、車馬相尚。謝靈運「車服鮮麗」。皆為例證¹⁷² 傅咸云：「古者大夫乃不徒行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。」周朗云：「見車馬不辨貴賤，視冠服不知尊卑。」¹⁷³ 可見當時逾制情況已嚴重混淆了貴賤尊卑的界線。

逾制的情況如此多，然則「制」的作用何在呢？大體上，法度只對具有政治忌諱的僭越特別注意，前面提到的梁孝王、霍禹、韓延壽諸例都是觸及政治忌諱，甚至有謀反之嫌，因此其重點尤在於「僭」，只奢而不僭不構成大罪。從前兩節所述看來，輿服制度的另一重點是官僚等級的區劃，只要不用代表官僚身份高低的飾件及標幟、不用官方規定的儀仗（如伍伯之類），政府是無從管起的。故民間在政府儀仗之外，出入連車騎的例子也很多。¹⁷⁴ 尤其政府對民間典禮，如婚、喪、祭等場合一向不大干涉，如婚禮，「車駟數里，緹帷竟道，騎奴侍童，夾轂並引」的情形不易禁絕¹⁷⁵。送葬數千輛亦然。祭祀如《三國志》卷一注引《魏書》載漢末青州城陽景王之祀，「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，……歷世長吏無敢禁絕者，太祖到，皆毀壞祠屋，止絕官吏民不得祠祀。……」可見甚至採

171 《後漢書》卷七八〈宦者列傳·曹節〉，頁2526-2527；同書卷六七〈黨錮列傳〉，頁2199；同書卷六八〈許劭傳〉，頁2234。

172 《三國志》卷九〈曹爽傳〉，頁284-285。《晉書》卷三〈何曾傳〉，頁989。《宋書》卷三〇〈五行志〉，884。《梁書》卷二八〈魚弘傳〉，頁422。《南史》卷一五〈徐湛之傳〉，頁436；同書卷一九〈謝靈運傳〉，頁538。

173 《晉書》卷四七〈傅咸傳〉，頁1324-1325。《宋書》卷八二〈周朗傳〉，頁2098。

174 例如司馬相如去官歸蜀，「從車騎，閒雅甚都。」周暉兄弟，「出入從車常百餘乘。」見《史記》卷一一七〈司馬相如列傳〉，頁3000-3001；《後漢書》卷四五〈周暉傳〉，頁1539。

175 王符，前揭書，頁55。按，婚禮是人生大事，往往允許逾制，稱為「攝盛」。俞正燮《癸巳存稿》卷二〈婚禮攝視議〉：「《儀禮·士婚禮》云：『主人爵弁，……乘墨車，從車二乘，……』」注云，「主人，婿也，墨車，漆車也，士而乘車墨車，攝盛也。」……《唐書·車服志》云：「庶人昏，假絳公服，百官女嫁廟見，攝母服。」《明史·輿服志》云：「庶人婚，許假九品服。」亦攝盛也。《大清會典·禮部·婚禮》云：「……士昏禮得視九品官，庶民輿服采飾均得視士，」是亦視九品官，皆攝盛也。」按禮，士當乘棧車，故乘大夫所乘之墨車為攝盛。漢代有無攝盛的規定不可知，但觀俞氏所引，歷代皆有類似的規定。

用官方儀仗也久未被禁止。

如前所說，就輿服制度而言，原則上過與不及皆在所禁，但事實上政府對逾制問題較為注意，即輿服只可不及而不可過。一般也將制度的破壞歸因於「逾制」，卻往往忽略了「不及」也會帶來制度的變遷。其實有能力「僭越」者畢竟是少數，整體士風的「薄屋者為高，霍食者為清」影響更大，牛車之取代馬車與此有相當關係。

六、牛車的興起

從漢末到魏晉以下，車駕制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，其特點之一，是「以賤入貴」的現象，以往平民所用的驢車、牛車都為上層階級所用，¹⁷⁶牛車甚至進入車騎行列（鹵簿）制度中（見上），成為士大夫的常乘。這種變化需要從牛車興起的過程及時代背景來理解。以下先敘述牛車興起的情形。

古代的「車」大多指馬車而言，而牛車是大車，常用以載物，也是一般平民所乘。前漢乘牛車者，如游俠朱家，「衣不完采，食不重味，乘不過駒牛。」蔡義家貧，「常步行，好事者乃為義買犢車，令乘之。」朱雲居田間，「時出乘牛車從諸生」。宣帝外祖母家破敗隱匿，帝後求得，時乘黃牛車，百姓謂之「黃牛羈」。¹⁷⁷除了貧者乘牛車外，基層官吏也有乘牛車者。秦簡《秦律十八種》中的〈金布律〉規定，都官有秩吏及其分支機構的嗇夫、佐、史，每十人分配牛車一兩，並配有趕車的「僕」，十人以下也各有規定，這些牛車應是下層官吏執行公務所共用，至於是用以乘坐或用以載物已不可知。¹⁷⁸不過從漢簡中看，一般民衆與下層官吏乘牛車者，可能是載物兼載人。¹⁷⁹至於上層階級乘坐牛車都有特別原因，例

176 關於驢，《續漢志》卷一三〈五行一〉：「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，躬自操轡，……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，至乘輜駟以為騎從，互相侵奪，賈與馬齊。」是當時皇帝公卿亦流行駕驢。《後漢書》卷三六〈張霸傳〉：「常乘驢車至縣賣藥」。

177 以上見《史記》一二四〈游俠列傳〉，頁3184。《漢書》卷六六〈蔡義傳〉，頁2898；同書卷六七〈朱雲傳〉，頁2916；同書卷九七上〈外戚傳〉，頁3961。

178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，《睡虎地秦墓竹簡》，頁58-59。

179 例如居延漢簡43.13：「□部吏陽里大夫封轅年廿八長七尺二寸黑色牛一車一兩五月戊戌出□□一□□」280.3：「□書佐忠時年廿六長七尺三寸黑色牛車一乘第三百九十八

如漢初，在秦末大亂之後，民生凋敝，「自天子不能具鈞駟，而將相或乘牛車」。武帝削諸侯之權後，諸侯及其後代「貧者或乘牛車」。始元五年，有一男子乘黃犢車詣闕，自稱是失蹤的衛太子。東漢光武提倡節儉，法禁甚嚴，以至使宗室諸王、外家諸親「至或乘牛車，齊於編人。」皆其著例。¹⁸⁰總之，牛車不是窮人下吏所乘，就是破落的諸侯所乘。上層階級除了特殊情況外，大部份乘的是馬車。

但到了東漢後期，牛車逐漸流行，乘坐者已不只是一般平民，還包括許多富貴之家。例如劉寬為順帝時司徒劉崎之子，曾出行，有人失牛，就寬車中認之，寬下駕步歸，是三公子亦乘牛車。¹⁸¹《後漢書》卷七八〈單超傳〉載桓帝時的宦官：

其後四侯轉橫，……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。

呂思勉認為其駕牛車而不駕馬車，是因為屬僕從身分，¹⁸²但如比較其他例子，則此一說法難以成立。例如同時代的北海人孫賓碩也是「乘犢車，將騎入市」，孫賓碩是北海大族，「閭門百口」¹⁸³，而亦如此。這種以牛車為中心，騎馬者為隨從的出行隊伍（「乘牛車而從列騎」），正與魏晉以下車駕出行的新形態相合。乘坐者並非無馬，但卻駕牛車，馬則用以從行，說明牛車已漸取代馬車。官吏方面，如魯肅自云若投降曹操，「獨不失下曹從事，乘犢車，從吏卒，交游士林，累官故不失州郡也。」呂虔檄王祥為別駕，祥弟覽替他準備車牛才應召。¹⁸⁴其實當時乘牛車的不只這些「下曹從事」。漢獻帝被挾持遷都安邑時乘牛車姑且不論；其他如曹操贈太尉楊彪駕二牛的「畫輪四望通轡七香車」，其妻卞氏亦贈彪妻袁氏以自己常乘的七香車。¹⁸⁵操又賜奉車都尉馮弘車牛。¹⁸⁶孫權也有「車中八

出」；334.33：「驪軒萬歲里公乘兒倉年卅長七尺二寸黑色劍一已入牛車一兩」關於漢簡中的車馬問題，將於〈漢簡中的車馬〉一文中討論，此處不贅。

180 《史記》卷三〇〈平準書〉，頁1417；同書卷五九〈五宗世家〉，頁2104；《漢書》卷七一〈不疑傳〉，頁3037；《後漢書》卷三三〈朱浮傳〉，頁1141-1144。

181 《後漢書》卷二五〈劉寬傳〉，頁886。

182 呂思勉，《秦漢史》，頁559。

183 《三國志》卷一八〈張就傳〉，頁551-552，裴注引《世語》。

184 《三國志》卷五四〈魯肅傳〉，頁1269-1270。《晉書》卷三三〈王祥傳〉，頁987-988。按，王祥事在漢末。

185 獻帝牛車見《三國志》卷六〈李傕傳〉。曹操及其妻贈楊彪夫婦牛見《曹操集》《文集》卷三〈與太尉楊彪書〉，頁63及殷芸，《小說》，頁105-106。

186 《三國志》卷八〈公孫淵傳〉，頁257，裴注引《魏名臣奏》。

牛」。¹⁸⁷。趙岐被徵，自乘車牛南說劉表；丁斐從曹操南征，以家牛私易官牛；¹⁸⁸是牛車普遍流行於上層階級。《晉書·輿服志》總結其發展云：

古之貴者不乘牛車，漢武帝推恩之末，諸侯寡弱，貧者至乘牛車，其後稍見貴之。自靈獻以來，天子至士遂以為常乘。……

可見牛車的地位已完全建立。

晉至隋牛車的使用，宋程大昌、清錢大昕都已舉了一些例證¹⁸⁹，這裡再稍加說明。車駕鹵簿中有不少牛車，已見上文。其極端的例子是隋皇帝屬車八十一乘，全是牛車。《晉書·武帝紀》：「有司嘗奏御牛青絲紉斷，詔以青麻代之。」是皇帝不只屬車用牛，亦嘗自乘。北魏天興五年，牛大疫，輿駕所乘巨犢數百頭亦同日斃於路側，可見魏室輿駕用牛甚多。¹⁹⁰北齊皇帝納后也是以牛車相迎。¹⁹¹漢代賞賜臣下常用馬車，而此時常用牛車。例如晉魏舒被賜陽燧四望總戶皁輪車牛一乘；晉明帝賜劉超官外廐牛；劉裕賜吳隱之車牛；南齊武陵昭王因牛羸弱，給副御牛一頭；南齊高宗並以常所乘白輪牛賜蕭穎胄；北魏時高允被賜蜀牛一頭，四望蜀車一乘；趙黑卒，贈車牛二十乘；齊獻武王給常景車牛四乘。¹⁹²王公大臣乘牛車的記載很多。《晉書·王衍傳》：「遷太尉，……時洛陽危逼，……而衍獨賣車牛以安衆心。」同書〈王導傳〉載導妻曹氏性妒，知導在外密營別館，將往，導恐衆妾被辱，遽登車，急以所執塵尾柄驅牛而進。《南齊書·謝超宗傳》：「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王僧虔，聞道壞，墜水；僕射王儉嘗牛驚，跳下車，超宗撫掌笑戲曰：『落水三公，墮車僕射。』」褚淵曾將所乘黃牛給招提寺，死後

187 《三國志》卷四七〈吳主權〉，頁1132-1133。

188 《後漢書》卷六四〈趙岐傳〉，頁2124；《三國志》卷九〈諸夏侯曹列傳〉，頁289，裴注引《魏略》。

189 程大昌說見於馬端臨，《文獻通考》卷一一九，頁1072。但程氏將「服牛乘馬」之「乘」說成騎馬，因而說「上古駕車則皆用牛，無用馬者。」是一種誤解，其實「乘馬」即是以馬駕車。錢大昕之說見《廿二史考異》，卷二〇〈晉書三·輿服志〉條，頁409-411。

190 見《魏書》卷九一〈晁崇傳〉，頁1943-1944。

191 《隋書》卷九〈禮儀四〉頁177-178。

192 《晉書》卷四一〈魏舒傳〉，頁1188；同書卷七〇〈劉超傳〉，頁1875-1876；同書卷九〇〈吳隱之傳〉，頁2342；《南齊書》卷三五〈武陵昭王曄〉，頁625-626；同書卷三七〈蕭穎胄傳〉，頁666；《魏書》卷四八〈孫綽傳〉，頁1088-1089；同書卷八二〈常景傳〉，頁1806；同書卷九四〈趙黑傳〉，頁2017。

由其弟贖回；是三公輩多乘牛車。¹⁹³梁宗室蕭曄爲晉陵太守，常乘折角牛；蕭琛爲吳興太守，郡有項羽廟，前後太守到任都殺軛下牛以祭，琛獨禁止，可見歷任太守也都乘牛車。¹⁹⁴北朝方面如北魏北海元王詳與咸陽王禧、彭城王勰並被召入，共乘犢車；宗室元仲景爲中尉，每向臺，駕赤牛，號「赤牛中尉」；爾朱世隆封王，亦駕牛車。¹⁹⁵若照《北齊書·琅玕王儼傳》所說見御史中丞出行「王公皆遙住車，去牛，頓軛於地，以待中丞過。」則王公無不乘牛。至於士大夫乘牛車的例子甚多，不備舉。

牛車的發展，也反映在當時墓葬陪葬品及裝飾的變化上。前漢墓中偶有牛車，但多是用爲馬車的陪襯，用以載物。例如西漢前期江陵鳳凰山八號墓的遣策載：「牛車一乘，載□□三束」，¹⁹⁶同地的一六七號墓有明器木輅車二乘，牛車一兩，牛車載薪用¹⁹⁷西漢末的武威磨咀子墓中有木輅車、牛車，牛車內有穀物，顯然也是用以載物¹⁹⁸到了東漢，墓葬中的牛車如武威雷台墓中銅車馬之外，已有載人的銅牛車，旱灘坡的木俑牛車更有窗子，並以紙糊窗，內坐一俑。（圖一四）¹⁹⁹濟南城南張的畫像石，一牛車坐三人，後從三人。（圖一三）山東滕縣西戶口畫像石，一牛車坐二人，從一騎。（圖一五）山東滕縣大郭村畫像石牛車坐二人，（圖一二）這些車的車廂都不長，顯然專供坐乘，而非載物之車，其車廂及兩扶手，形制已與北魏出土的載人牛車無別。（圖一七）山東濟寧的一組畫像石，除了馬車行列外，也有了牛車行列，顯然風氣已有改變。²⁰⁰魏晉以下的墓葬中，馬車幾已消失，大多是牛車。例如江蘇金壇縣方麓的東吳墓即有陶牛車，南京象山東晉琅玕王氏的墓、濟南市東八里洼北朝墓、河北護鹿的北魏東梁州刺史閻靜

193 事見《南齊書》卷二三〈褚澄傳〉，頁432。

194 《南史》卷五二〈蕭曄傳〉，頁1304；《梁書》卷二六〈蕭琛傳〉，頁397。

195 《魏書》卷二一上〈北海王詳〉，頁561-562；同書卷一九上〈景穆十二王上〉，頁444；同書卷七六〈爾朱世隆傳〉，頁1670-1671。

196 見李均明，何雙全編，《散見簡牘合集》，頁五九。

197 江陵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發掘整理小組，〈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發掘簡報〉。

198 見甘肅省博物館前揭〈武威磨咀子三座漢墓發掘簡報〉，頁13。

199 見甘博文，〈甘肅武威雷台東漢墓清理簡報〉。黨壽山，〈甘肅省武威縣旱灘坡東漢墓發現古紙〉。

200 夏忠潤，〈山東濟寧發現一組漢畫像石〉。

墓也都有牛車。²⁰¹，北魏元劭墓出土陶牛車側有兩窗（圖一九），彭陽新集北魏墓中出土的牛車是與一大批騎馬、步行、鼓吹等俑一起，顯然構成以牛車為中心的行列，牛車輪轂及兩側擋板塗朱，象徵其身分。²⁰²這種以牛車為中心，以步、騎、鼓吹相從的形態，也可在西安草場坡北朝墓的明器中看出。²⁰³在壁畫方面，遼寧朝陽袁子台東晉的壁畫墓也是以牛車為中心，與此時、地相近高句麗冬壽墓（安岳三號墓）中的大行列圖，（圖二五）以張幟牛車為中心，步、騎為從，清楚的顯現當時的風氣。²⁰⁴北齊馮翊郡王高潤墓東壁的壁畫有牛車出行圖，²⁰⁵而東安郡王婁叡墓的壁畫其墓道兩側是騎馬出行及歸來隊伍、軍樂儀仗，甬道有門衛儀仗，墓室中則畫有牛車儀從。牛車張卷通幟，赤輪華轂，金飾諸末，有卷棚及帷帳。（圖二六）²⁰⁶墓葬所顯示的牛車行列，基本上與當時乘牛車的情況相合。

從魏晉以下人對牛車的觀念及風尚，也可看出牛車的發展。例如潘岳用牛車來影射當時的政治，《晉書》卷五五〈潘岳傳〉：

時尚書僕射山濤、領吏部王濟、裴楷等並為帝所親遇，岳內非之，乃題閣道為謠曰：「閣道東，有大牛。王濟鞅，裴楷輶，和嶠刺促不得休。」

這與以往用駕馭馬車來作譬者不同。²⁰⁷牛車的形制代表身份地位，陸雲在〈牛責季友〉一文中即假牛之口道出一般人的願望：²⁰⁸

今子之滯，年時云暮。而冕不易物，車不改度。子何不使玄貂左弭、華蟬右顧，令牛朝服青軒，夕駕輶輅，望紫微而風行，踐蘭塗而安步？

201 常州市博物館、金壇縣文管會，〈江蘇縣方麓東吳墓〉。南京市博物館，〈南京象山5號、6號、7號墓清理簡報〉。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，〈濟南市東八里注北朝壁畫墓〉。河北省正定縣文物保館所，〈河北護鹿發現北魏東梁州刺史閻靜遷葬墓〉。

202 新集北魏墓見寧夏固原博物館，前揭文。

203 閻磊，〈西安南郊草場坡北朝墓的發掘〉。

204 袁子台東晉壁畫墓見註一三五。冬壽墓大行列圖部分鉤摹圖見土居淑子，《古代中國の畫象石》，圖頁21。

205 見湯池，〈北齊高潤墓壁畫簡介〉。

206 參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、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員會，〈太原市北齊婁叡墓發掘簡報〉頁1-23。王天庥、鄧林秀、陶正剛，〈婁叡墓壁畫略說〉頁5-15。

207 例如《尚書·五子之歌》：「予臨兆民，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。」漢代崔駰的〈車左銘〉、〈車右銘〉、〈車後銘〉三文皆以御馬車為喻，見《崔亭伯集》，頁4-5。

208 陸雲，《陸雲集》，卷六，頁123。

當時名士清談則用牛來評論人物。《世說新語·品藻篇》載龐統評陸績、顧劭：²⁰⁹

「陸子所謂駑馬有逸足之用，顧子所謂駑牛可以負重致遠。」或問：「如所目，陸爲勝邪？」曰：「駑馬雖精速，能致一人耳。駑牛一日行百里，所致豈一人哉？」

如龐統之言，則牛車勝過馬車。同書又載：²¹⁰

明帝問周伯仁：「眞長（即劉惔）何如人？」答曰：「故是千斤犗特。」王公笑其言。伯仁曰：「不如捲角犗，有盤辟之好。」

伯仁以千斤駟牛不如犗牛之從容雅步，固是士族風氣，但當時人愛好牛車，希望得到的不是「駑牛」，而是「快牛」。例如王濟有牛名「八百里駟」²¹¹王愷與石崇賽牛車，愷不及，遂賄崇之都督及御車人，取得駕馭密訣。²¹²晉人賽牛，亦猶周人賽馬，故馬有千里，牛號八百。²¹³荀晞也有千里牛，往來兗州與洛陽。²¹⁴石勒母語勒：「快牛爲犢子時，多能破車。」²¹⁵宋時宗慤有佳牛堪進御，不肯賣，竟坐免官。²¹⁶當時人對車牛講究極精，宋劉德願善御車，可以打牛從狹窄的兩柱間穿過，孝武帝聞其能，使御畫輪車；南齊陳顯達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，而「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，王三郎烏，呂文顯折角，江年瞿曇白鼻，而皆集陳舍。」梁時宗室西豐侯正德及樂山侯正則皆好牛馬，號「西豐駱馬，樂山烏牛」。²¹⁷皆可見尚牛之風。

綜觀上述，可以看出牛車自後漢漸興，魏晉以下有取代馬車的趨勢。這個變化的原因何在呢？尚秉和指出：²¹⁸

209 見余嘉錫，《世說新語箋證》，頁500。

210 同上書，〈排調篇〉，頁797。

211 《晉書》卷四二〈王濟傳〉，頁1206。

212 見前揭《世說新語箋證》，頁881。

213 見尚秉和前揭《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》，頁145，〈晉世因尚牛車故貴人賽牛〉條。

214 《晉書》卷六一〈荀晞傳〉，頁1667。

215 同上書，卷一〇六〈石季龍上〉，頁2761-2762。

216 《宋書》卷七六〈宗慤傳〉，頁1972。

217 劉德願事見《宋書》卷三〇〈五行志〉，頁891及同書卷四五本傳，頁1376。陳顯達諸子見《南齊書》卷二六〈陳顯達傳〉，頁490及《南史》卷四五〈陳顯達傳〉，頁1134。蕭正德見《南史》卷五一本傳，頁1280。

218 尚秉和前揭《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》卷九，頁140，〈西漢士大夫因貧始乘牛車〉條。

蓋自武帝征匈奴後，馬少，貧者不能置，故乘牛車。而諸侯王尤國之貴族，亦乘牛車，於是社會慕之，乘者漸多，演為風俗。

尚氏將此一變化歸因於馬少及對貴族的倣效兩點。關於諸侯王乘牛車的問題，從上文的引證可知，是少數沒落的貴族因貧而乘，恐怕不能造成整個社會風氣的改變。至於馬少，則可能是原因之一，但東漢正是車馬出行最為講究之時，馬少在當時似乎並不明顯。勞幹指出：「漢末大亂，馬數驟減，牛車之用漸廣，遂代馬車而作乘人之車。」余嘉錫也有類似的看法，²¹⁹將馬少歸因於漢末以下之動亂較為合理。東晉南朝地處江南，不產馬，而多牛。馬的供應有賴掠奪、對外貿易、外交餽贈以及西南山區所產，²²⁰少數的馬又多用於戰爭，雖然政府鼓勵養馬，但仍不敷需要，²²¹甚至有時自衛仍用牛車。宋世何承天提出安邊之策，第三點是「纂耦車牛，以飾戎械，……參合鉤連，以衛其衆。」²²²可見馬的缺乏。在此情況下，日常所乘自然用牛，這是時代需要、地域客觀環境之不得不然。

但是牛車的流行南北並無不同，正如李劍農指出的，當時南北都以牛為主要交通動力。²²³北方並不缺馬，北朝畜牧業發達，²²⁴《魏書·食貨志》載世祖平統萬，以河西為牧地，馬至二百餘萬匹，牛羊無數，高祖即位，復以河陽為牧場，恆置戎馬十萬匹。在不缺馬的情況下，何以也用牛車？何況再缺馬，也不至連皇帝都無馬可用，而必須用牛來充副車。事實上，如前所說，漢末以下車隊行列是「乘牛車而從列騎」，主人乘牛車，馬則用為隨從，無論南北，官吏出行隊伍中並不缺馬，上述晉迄南北朝墓葬中步、騎儀衛的牛車行列即其明證。所以馬少、用於戰爭也許是牛車流行的部份原因，可以解釋一般人為何乘牛車，卻無法完全解

219 見勞幹，前揭書，考證之部，頁20，〈車馬一〉。余嘉錫，前揭書，頁37之箋證。

220 參考黎虎，〈六朝時期江左政權的馬匹來源〉，頁101-111。

221 《宋書》卷八二〈周朗傳〉載朗上書以為馬少，「令重車弱卒，與肥馬悍胡相逐」，自然失敗。所以主張「募天下使養馬一匹者，蠲一人役，三匹者，除一人為吏，自此以進階賞有差。」（頁2096）。孝武孝建三年五月下令：「荆、徐、兗、豫、雍、青、冀七州統內，家有馬一匹者，蠲復一丁。」可說採取了周朗之策。（見同書卷六〈孝武帝紀〉，頁118）。

222 《宋書》卷六四〈何承天傳〉，頁1707-1708。

223 李劍農，《魏晉南北朝經濟史稿》，頁92，及115-117。

224 參考陳文華，〈中國古代畜牧業的主要成就〉，頁259-323，收於所著《論農業考古》。

釋上層階級車制的變化。其實馬少，正可以顯示有馬者地位之高，何以馬車反失其重要性呢？

佛道思的想盛行似乎也可解釋部份事實。佛道都尚牛，道教有老子騎青牛（駕青牛車）的傳說。²²⁵在東漢的一些畫像磚中，西王母圖像下每有牛車，如山東滕縣大郭村畫像石中，西王母像下層有牛車載二人，後隨羊車亦載二人，羊身有翅；（圖一二）滕縣西戶口西王母像磚下層牛車載三人，後隨一輛載三人羊車及雙馬車，山西離石一石，一牛輜車在雲霧間，²²⁶這些都顯示當時人觀念中牛車的地位已不低。至於佛教，來自尚牛的印度，佛為「牛王」，佛跡為「牛跡」，佛教對牛至為重視。《妙法蓮華經》（《法華經》）曾以羊車、鹿車、牛車三品象徵聲聞乘、緣覺乘與菩薩乘，牛車即菩薩乘，是佛教徒追求的目標。《法華經》的譯本有幾種，一是西晉太康七年竺法護口授記錄的《正法華經》，另一種是姚秦弘始八年鳩摩羅什所譯的《妙法蓮華經》，還有更晚的譯本，但其影響力都不及鳩摩羅什的譯本大。當時的佛教徒熟悉三乘之說，如謝靈運的《緣覺聲聞合贊》云：「肇元三車，翻乘一道。」²²⁷北朝盛行造像，佛像下往往刻供養人與牛車，（圖二二、二三）²²⁸可能是受此影響。牛車的地位並不低似乎可以解釋何以高官也乘牛

225 《史記》卷六三〈老子韓非列傳〉，頁2141，集解引《列仙傳》：「老子西遊，關令尹望見有紫氣浮關，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也。」按此處所謂乘青牛，當指乘青牛車，不是騎牛。皇甫謐《高士傳》卷上〈老子李耳〉條：「以周德衰，乃乘青牛車去。」《太平御覽》卷七七三〈車部二〉引〈關令內傳〉：「果見老君乘青牛車來過。」皆云牛車。六朝甚崇尚青牛，例如宋宗室劉德嗣弟名青牛、智藏，顯然與道家有關。（《宋書》卷三九〈桂陽王休範傳〉，頁2051-2052）。又《陳書》卷五〈宣帝本紀〉：「監豫州陳桃根於所部得青牛，獻之。」青牛在當時人觀念中，似具辟邪之效，晉代裴齊的《裴子語林》有一則故事：宗岱為青州刺史，禁淫祀，著《無鬼論》甚精，有一書生與之辯，不能勝，憤然說：「君絕我輩血食二十年，君有青牛髻奴，所以未得相困耳；奴已叛，牛已死，今日得相制矣。」言絕不見，不久而岱亡。又梁劉孝威有《辟厭青牛畫贊》，收於《全梁文》卷六一，頁一二。

226 見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，《中國美術全集·繪畫編》第18冊《畫像石畫像磚》，圖32及圖187。

227 顧紹柏校注，《謝靈運集校注》，頁309。

228 這種例子很多，例如陝西臨潼的北周造像碑，其碑陰即刻有牛拉篷蓋車，車前一人執杖前導，車後隨二人。見趙康民，〈陝西臨潼的北朝造像碑〉。又如北周王令猥造像碑下部刻兩牛車，其一有「忘息女口乘車供養佛時」等字，另一則刻五個供養者的同樣字句。見吳怡如，〈北周王令猥造像碑〉。

車，不過，這種說法不能解釋何以牛車在佛教尚非十分普遍的東漢末已流行，也無直接證據證明牛車流行與此有關。

從實際的角度看，交通工具的使用，方便應是重要考慮之一。牛車重心較低，較易駕御，具有較大的載負力及耐力，車廂寬敞舒適²²⁹，價格也比馬車低，也許是流行原因之一。不過由漢迄隋，牛車駕系方法似乎沒有太大的改變，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料從技術上解釋這種變化。但是，相對於牛車的發展，當時對馬的使用卻有相當的突破。魏晉南北朝時期，由於騎戰的發展、馬具的改良（例如馬鐙的出現²³⁰），都使騎馬風氣逐漸普遍，這種情形北朝更為明顯。對當時北方游牧民族而言，馬用於騎乘可能比用於駕車更為方便。例如上述婁叡墓壁畫中，除了牛車外，也有墓主騎馬的出行圖²³¹。騎馬風氣使馬的使用觀念發生改變，用於駕車者相對減少，牛車遂漸比馬車為普遍。

但是技術上的原因也並不充分，因為在騎馬風氣之前牛車即已流行於上層社會。如果回顧上述牛車興起的經過，則不能不承認東漢是關鍵時期，牛車的發展是透過東漢長期的蘊釀，尤其東漢後期更值注意。因此要探究其興起原因，不能不在東漢社會中尋求，而其關鍵的問題則是東漢的士風。如前所說，牛車在民間的使用本即較馬車為廣，我們要探究的不是其在民間的應用，而是它如何進入上層階級，並影響了車駕制度，因此魏晉士族的前身——漢末名士的風尚特別值得注意。

東漢自光武倡名節之後，逐漸形成優美的士風。選舉必採名譽，而名譽以「清」為最高標準，「羸車敗馬」本是其特徵。尤其中期以下，主荒政謬，士子奮起，力糾時弊，形成了「清流」。這些士人在入仕之後，仍保留了清儉之風，其標榜民間常乘之柴車輦輶（大多是牛車）是很自然的，車駕的變化因此而生。根據學者研究，東漢的許多士人之家，即使是歷世二千石的世家，也都標榜清白，多

229 一輛馬車最多載三人，而牛車可載多人，其車箱較馬車為寬敞。根據上文所引龐統的話，牛車所載較馬車為多。又《九章算術》第六卷〈均輸〉頁52有牛車載粟二十五斛，六人共車的記載。

230 馬鐙的發展在魏晉以後，而同時馬鞍及其他馬具也改進不少，更便騎乘，參考楊泓，〈中國古代馬具的發展和對外影響〉。

231 參考前揭〈太原市北齊婁叡墓發掘簡報〉，頁16-18。

陷貧困。²³²如楊震之卒，以牛車載歸。靈帝時太尉李咸，退休由其子駕敝牛車返家。²³³清流領袖如任司隸校尉的李膺，曾與郭泰共載薄笨車（牛車）。²³⁴許荆爲吏無船車。王暢爲南陽守，豪族相尚奢糜，暢車馬羸敗，以糾其弊。²³⁵初平中，袁忠爲沛相，乘葦車到官。²³⁶建安初，時苗爲壽春令，乘薄傘車、黃犢牛，離任時留其所生犢，云：「令來時本無此犢，犢是淮南所生有也。」²³⁷士大夫愈窮苦，名愈高，如趙壹乘柴車，名動京師。名士郭泰之卒，自函谷關以西，河內湯陰以北，「二千里笈荷擔彌路，柴車葦裝塞塗，蓋有萬數來赴。」韓康伯賣藥不二價，被徵，乘柴車（牛車）至亭，亭長方發人牛修橋以待「韓徵君」，見他柴車幅巾，以爲田叟，便奪其牛，康釋駕與之。仲玉爲部從事，柴車駕牛，以荆爲屏。²³⁸許慶爲督郵，家貧乘牛車，鄉里號曰「輅車督郵」，是牛車已被稱爲「輅車」，牛車輅之稱，無待於晉。²³⁹這些例子皆可見當時士風。相反的，凡是車馬鮮麗者，皆得惡評，如東漢汝南袁、弘農楊並爲名族，但袁氏車馬衣服極爲奢僭，因此當時認爲不及楊氏。²⁴⁰即使車服奢麗的袁氏，亦不敢輕視寒士，前引表紹「士無貴賤，與之抗禮，輅駟柴轂，填接街陌」，可見一時風氣。

這種風氣至魏初猶然。《三國志》卷二三〈和洽傳〉：

（洽爲丞相掾屬）時毛玠、崔琰並以忠清幹事，其選用先尚儉節。洽言曰：「……儉素過中，……以此節格物，所失或多。今朝廷之議，吏有著新衣，乘好車者，謂之不清；……形容不飾，衣裘敗壞者，謂之廉潔。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，藏其輿服；……凡激詭之行，則容隱僞矣。」

232 見矢野主稅，《門閥社會成立史》，〈序章〉，頁4-15。

233 楊震事見《後漢書》卷五四〈楊震傳〉，頁1767，李賢注引《謝承書》。李咸事見同書卷四四〈胡廣傳〉，頁1511，李賢注引《謝承書》。

234 事見前揭殷芸《小說》，頁101。

235 《後漢書》卷七六〈許荆傳〉，頁2471注引《謝承書》。同書卷五六〈王暢傳〉，頁1825。

236 《後漢書》卷四五〈袁忠傳〉，頁1526。

237 《三國志》卷二三〈常林傳〉，頁662注引《魏略》。

238 《後漢書》卷八〇下〈趙壹傳〉，頁2632。同書卷六八〈郭泰傳〉，2227。韓康事見註六一。仲玉事見《太平御覽》七七六，頁七引《郭林宗別傳》。

239 事見《太平御覽》卷七七五，頁2〈輅車〉條引《謝承書》。

240 《後漢書》卷五四〈楊震傳〉，頁1790注引《謝承書》。

《三國志》〈徐邈傳〉載盧欽之言：「往者毛孝先、崔季珪等用事，貴清素之士，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」此可見虛偽之弊，但也反映了士大夫的崇尚。這種名位與衣服「不稱」的情況，正是造成車駕制度中「以賤入貴」變化的原因之一。以下一例值得注意。《後漢書》卷八二上〈謝夷吾傳〉：

（謝為鉅鹿太守）後以行春乘柴車，從兩吏（柴車，賤車也）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，有損國典，左轉下邳令。

「國典」即在漢末的士風中逐漸改變。

總之，牛車的興起，原因非常複雜，除了外在環境的變遷外，東漢中葉以下的士風使牛車流行於上層社會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。擴大的說，牛車的發展，是民間原已普遍使用的交通工具，以漢末清流士風為媒介，而逐漸普及於上層社會。漢末清流是魏晉士族的前身，牛車之進入車駕制度，與士族的發展恰相一致。魏晉以下隨著士族的貴族化，牛車也愈華麗，新的等級區劃因而出現。

七、結 語

明代的王世貞在《藝苑卮言》中指出²⁴¹：

凡三代、兩漢皆用馬車，魏晉至梁、陳皆用牛車。元魏君臣有乘馬及牛車者。唐雖人主妃后非乘馬即步輦，自郊祀之外，不乘車也。

從以上引文，可以看出車駕制度變遷的大勢。從漢代的馬車到晉隋的牛車，社會的變動與器物的發展密切相關。在這段時期內，車駕作為社會地位的象徵，具有相當的重要性。但車駕盛行之同時，另有兩種新的交通工具也已出現，逐漸代替了車的地位，即「肩輿」以及王氏所說的騎馬之風。關於兩者的興起，有待另文討論，這裡僅略述其發展，以為本文的結束。

肩輿是由「輦」變來的。輦原亦為車的一種，《宋書·禮五》：「輦車，……漢制乘輿御之，或使人挽，或駕果下馬。……未知何代去其輪。」《宋書·鄧琬傳》載琬將乘車除腳以為輦，可見其與車的關係。輦以人挽，即是步輦，去其輪，則變為肩輿。肩輿由於東晉南朝處江南，多山區，士大夫出遊坐乘較便，逐漸流

241 見王世貞《藝苑卮言附錄》四，頁9。收於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。

行。士大夫之乘者，如陶淵明，使一門生與二兒輦之；王獻之經吳郡，乘平肩輿入顧辟疆園，皆其例。²⁴²不過由於肩輿以人代畜，為士大夫所反對。所以入唐以後，只有貴戚大臣經特旨才能乘，真正流行要到南宋以後²⁴³，其對车的地位影響較小。

與肩輿相較，騎馬風氣的發展影響較大。漢代士大夫基於體制，出必乘車，少有騎馬者（騎者多是下吏），偶有騎者則受糾彈（如前引韋玄成之例）南朝猶然。這種情形唐代的劉知幾曾加討論。他在唐景龍二年主張恢復乘車的上奏中說：²⁴⁴

古者自大夫以上皆乘車，而以馬為駟服。魏、晉已降，迄于隋代，朝士又駕牛車，……至如李廣北征，解鞍憩息；馬援南伐，據鞍顧盼。斯則鞍馬之設，行於軍旅，戎服所乘，便於貴習者也。案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，則為御史所彈。又顏延之罷官後，好騎馬出入閭里，當代稱其放誕…

…

知幾所說與《顏氏家訓·涉務篇》所言梁世士大夫「出則車輿，入則扶持，郊郭之內無乘馬者」相合。但由於戰爭頻仍，戎服常用，士大夫之習於騎者也逐漸多起來。如晉的王湛、王濟叔侄皆善騎術，類似例子見於《世說新語》者亦復不少。²⁴⁵至於北朝，起於代北，更善騎射，騎馬風行，不但使馬車的使用漸少，也逐漸影響了車（包括牛車）在出行隊伍中的地位。到了唐除了特殊場合，已不用車。知幾續云：

自皇家撫運，沿革隨時。至如陵廟巡幸，則盛服冠履，乘彼輅車。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，亦時以服箱充馭。在於他事，無復乘車，貴賤所行，通鞍馬而已。

可見到了唐，士庶已少有乘車，被騎馬所取代。雖然劉知幾呼籲恢復乘車，已不可行，车的黃金時代可說已完全過去了。

（本文於八十一年二月二十日通過刊登）

242 《晉書》卷九四〈陶潛傳〉，2462。同書卷八〇〈王獻之傳〉，頁2105。

243 關於肩輿（後世之轎）的發展，可參考陳登原，《國史舊聞》卷四六，頁1415〈轎子〉條。歷代轎子禁令的探討參考瞿同祖《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》，頁117-118。

244 《舊唐書》卷四五〈輿服志〉，頁1949-1951。

245 詳見余嘉錫，前揭《世說新語箋證》，頁37余氏箋證所引各例。

引用書目

- 《左傳》，阮刻《十三經注疏》本。
- 《周禮》，阮刻《十三經注疏》本。
- 《尚書》，阮刻《十三經注疏》本。
- 《詩經》，阮刻《十三經注疏》本。
- 《論語》，阮刻《十三經注疏》本。
- 《禮記》，阮刻《十三經注疏》本。
- 韋 昭，《國語韋氏解》，台北，世界書局影嘉慶讀未見書齋重刊天聖明道本，1968。
- 安井衡，《管子纂詁》，台北，河洛圖書出版社，1976。
- 司馬遷，《史記》，新校標點本。
- 班 固，《漢書》，新校標點本。
- 劉珍等撰，吳樹平校注，《東觀漢記校注》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87。
- 范 曄，《後漢書》，新校標點本。
- 司馬彪，《續漢書》，附於范曄，《後漢書》後，新校標點本。
- 陳 壽，《三國志》，新校標點本。
- 房玄齡等，《晉書》，新校標點本。
- 沈 約，《宋書》，新校標點本。
- 蕭子顯，《齊書》，新校標點本。
- 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新校標點本。
- 姚思廉，《陳書》，新校標點本。
- 魏 收，《魏書》，新校標點本。
- 李百藥，《北齊書》，新校標點本。
- 令狐德棻，《周書》，新校標點本。
- 李延壽，《南史》，新校標點本。
- 李延壽，《北史》，新校標點本。
- 魏徵等，《隋書》，新校標點本。

歐陽修等，《唐書》，新校標點本。

揚雄，《太玄經》，司馬光注，四部備要本，台北，中華書局，1974。

班固，《白虎通義》，陳立疏證，台北，商務印書館《國學基本叢書》本，1968。

崔駰，《崔亭伯集》，張溥，《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》本。

王符，《潛夫論》，汪繼培箋本，台北，世界書局，1975。

胡廣，《漢官解詁》，台北，中華書局，《四部備要》所收《漢官六種》本。

劉徽注，《九章算術》，上海，古籍出版社，1990。

蔡邕，《獨斷》，嚴秉衡校，增訂漢魏叢書本，台北，大化書局影印。

應劭，《漢官儀》，收於《漢官六種》中，台北，中華書局《四部備要》本。

王利器，《風俗通義校注》，北京，中華書局，1981。

劉熙，《釋名》，增訂漢魏叢書本，台北，大化書局影印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，《曹操集》，北京，中華書局，1959。

俞紹初輯校，《建安七子集》，北京，中華書局，1989。

唐滂，《唐子》，《玉函山房輯佚書》本。

陸雲，《陸雲集》，黃葵點校本，北京，中華書局，1988。

常璩，《華陽國志》，劉琳校注本，成都，巴蜀書社，1984。

皇甫謐，《高士傳》，四部備要本，台北，中華書局，1978。

裴齊，《裴子語林》，周樹人《古小說鉤沈》本，台北，盤庚出版社，1978。

蘇彥，《蘇子》，馬國翰《玉函山房輯佚書》輯本。

顧紹柏校注，《謝靈運集校注》，河南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87。

余嘉錫，《世說新語箋證》，台北，華正書局，1984年9月。

殷芸，《小說》，周樹人輯校，《古小說鉤沈本》，台北，盤庚出版社，1978。

王利器，《顏氏家訓集解》，上海，古籍出版社，1980。

張彥遠，《歷代名畫記》，收於《美術叢刊》第二輯，台北，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，1964。

封演，《封氏聞見記》，曹秋岳《學海類編》本，台北，文海出版社。

劉知幾，《史通》，台北，華世出版社《史通釋評》本，1975。

劉 增 貴

- 李昉等，《太平御覽》，台北，商務印書館，《四部叢刊三編》本，1974。
- 方 回，《續古今考》，《雜著秘笈叢刊》本，台北，學生書局景萬曆十二年王圻校刊本，1971。
- 馬端臨，《文獻通考》，上海，商務印書館《萬有文庫》本，1936。
- 王世貞，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，台北，偉文圖書公司影世經堂本，1976。
- 俞正燮，《癸巳存稿》，台北，商務印書館，1971。
-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，《睡虎地秦墓竹簡》，北京，文物出版社，1978。
- 錢大昕，《廿二史考異》，收於台北，鼎文出版社《錢大昕讀書筆記廿九種》。
- 羅振玉，《漢兩京以來鏡銘集錄》，收於《遼居雜著》，第七冊。
- 嚴可均校輯，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》，北京，中華書局影印，1987。
- 張鵬一，《晉令輯存》，徐青廉校補，西安，三秦出版社，1989。
- 大葆台漢墓發掘組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，《北京大葆台漢墓》，北京，文物出版社，1989。
-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山東省博物館，《山東漢畫像石選集》，濟南，齊魯書社，1982。
-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、北京儀器廠工人理論組編寫，《滿城漢墓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78。
-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，《中國美術全集·繪畫編》第1冊《原始社會至南北朝繪畫》，北京，人民美術出版社，1986。
-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，《中國美術全集·繪畫編》第18冊《畫像石畫像磚》，上海，人民美術出版社，1988。
-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，《中國美術全集·雕塑編》第3冊《魏晉南北朝雕塑》，北京，民美術出版社，1988。
- 王子雲，《中國古代畫像石選集》，北京，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，1957。
- 王今棟，《中國古代車馬》，河南人民出版社，1984。
- 不著撰人，《漢唐壁畫》，北京，外文出版社，1974。
- 北京歷史博物館、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，《望都漢墓壁畫》，北京，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，1955。

- 呂思勉，《秦漢史》，台北，台灣開明書店，1967。
- 李均明、何雙全，《散見簡牘合集》，北京，文物出版社，1990。
- 李發林，《山東漢畫像石研究》，濟南，齊魯書社，1982。
- 李劍農，《魏晉南北朝經濟史稿》，北京，三聯書店，1959。
- 杜正勝，《編戶齊民——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》，台北，聯經出版社，1990。
- 周一良，《魏晉南北朝史札記》，北京，中華書局，1985。
- 尚秉和，《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》，台北，商務印書館，1975。
- 南京博物館、山東省文物管理處，《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》，北京，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出版，1956。
- 南陽漢代畫像石編輯委員會，《南陽漢代畫像石》，北京，文物出版，1985。
- 洛陽古墓博物館，《洛陽古墓博物館》，洛陽，朝華出版社，1987。
- 袁庭棟、劉澤模，《中國古代戰爭》，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，1988。
- 馬非百，《秦集史》，北京，中華書局，1982。
- 高文，《四川漢代畫像磚》，上海，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，1987。
- 陳文華，《論農業考古》，南昌，江西教育出版社，1990年。
- 陳登原，《國史舊聞》，台北，明文書局，1984年3月影版。
- 勞幹，《居延漢簡·考釋之部》，史語所專刊之四十，台北，1968。
- 董說，《七國考》，台北，世界書局，1973。
- 劉志遠、余德章、劉文杰，《四川漢代畫象磚與漢代社會》，北京，文物出版社，1983。
- 瞿同祖，《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》，台北，台灣崇文書店，1974影版。
- 土居淑子，《古代中國の畫象石》，京都，同朋社，1986。
- 矢野主稅，《門閥社會成立史》，東京，國書刊行會，1976。
- 林巳奈夫，《漢代の文物》，京都，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，1976。
-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、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員會，《太原市北齊婁叡墓發掘簡報》，《文物》，1983年10期。
-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，《濟南市東八里注北朝壁畫墓》，《文物》，1989年4期。

劉 增 貴

山東省博物館，〈曲阜九龍山發掘簡報〉，《文物》，1972年5期。

內蒙古文物工作隊、內蒙古博物館，〈和林格爾發現一座重要的東漢壁畫墓〉，《文物》，1974年1期。

六安縣文物管理所，〈安徽六安發現西漢車馬坑〉，《考古》，1991年1期。

王天庥、鄧林秀、陶正剛，〈婁叡墓壁畫略說〉，《中國藝術》，創刊號，1985.7。

王 愷，〈蘇魯豫皖交界地區漢畫像石墓的分期〉，《中原文物》，1990年1期。

王學理，〈五時副車銅偶所反映的秦代鑾駕制度〉，收於《秦陵二號銅車馬》。

甘博文，〈甘肅武威雷台東漢墓清理簡報〉，《文物》，1972年2期。

甘肅省博物館，〈武威磨咀子三座漢墓發掘簡報〉，《文物》，1972年12期。

安金槐、王與剛，〈密縣打虎亭漢代畫像墓和壁畫墓〉，《文物》，1972年10期。

余扶危、賀官保，〈洛陽東關東漢殉人墓〉，《文物》，1973年2期。

吳怡如，〈北周王令猥造像碑〉，《文物》，1988年2期。

吳曾德，〈漢代的車騎出行〉，《考古與文物》，1985年2期。

杜正勝，〈周禮身分制之確立及其流變——特從隨葬禮器論〉，中央研究院第二屆漢學會議論文，1986，未刊。

邢義田，〈漢代壁畫的發展和壁畫墓〉，收於所著《秦漢史論稿》，台北，東大圖書公司，1987。

岳鳳霞、劉興珍，〈浙江海寧長安鎮畫像石〉，《文物》，1984年3期。

武伯綸，〈秦漢車制雜議〉，《西北大學學報·哲學社會科學版》，1984年1期。

河北省正定縣文物保館所，〈河北護鹿發現北魏東梁州刺史閻靜遷葬墓〉，《文物》，1986年5期。

金維諾，〈北齊繪畫遺珍〉，《中國藝術》，創刊號，1985.7。

南京市博物館，〈南京象山5號、6號、7號墓清理簡報〉，《文物》，1972年11期。

胡平生，〈阜陽漢簡《詩經》異文初探〉，收於胡平生、韓自強編著，《阜陽漢簡詩經研究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。

胡念耕，〈「車」、「居」同音可以假借〉，《文物》1985年3月。

夏忠潤，〈山東濟寧發現一組漢畫像石〉，《文物》，1983年5期。

夏超雄，〈孝堂山石祠畫像、年代及主人試探〉《文物》，1984年8期。

孫 機，〈始皇陵二號銅車馬對車制研究的新啟示〉，《文物》，1983年7期。

秦俑考古隊，〈秦始皇陵二號銅車馬初探〉，《文物》，1983年7期。

袁仲一，〈秦陵二號銅車馬的形制及系駕方法〉，收於袁仲一等編，《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論文選》，西北大學出版社，1989。

袁仲一、程學華，〈秦陵二號銅車馬〉，收於陝西省秦俑考古隊、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，《秦陵二號銅車馬》，《考古與文物》編輯部出版，1983。

陝西省秦俑考古隊，〈秦始皇陵一號銅車馬清理簡報〉，《文物》，1991年1期。

党壽山，〈甘肅省武威縣旱灘坡東漢墓發現古紙〉，《文物》，1977年1期。

參考黎虎，〈六朝時期江左政權的馬匹來源〉，《中國史研究》，1991年1期。

常州市博物館、金壇縣文管會，〈江蘇縣方麓東吳墓〉，《文物》，1989年9月。

許倬雲，〈周代的衣食住行〉，《史語所集刊》，四十七本三分，1976。

陳 直，〈居延漢簡綜編〉，收於所著《居延漢簡研究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86。

陳 槃，〈春秋列國的交通〉，《史語所集刊》，三十七本下冊，1967。

勞 幹，〈論漢代之陸運與水運〉，《史語所集刊》，第十六本，1948。

湯 池，〈北齊高潤墓壁畫簡介〉，《考古》，1979年3期。

湯 池，〈東魏茹茹公主墓壁畫試探〉，《文物》，1984年4期。

楊 泓，〈中國古代馬具的發展和對外影響〉，《文物》，1984年9期。

楊英杰，〈先秦古車挽馬部分鞍具與馬飾考辨〉，《文物》，1988年2期。

嘉祥縣文管所，〈山東嘉祥紙坊畫像石墓〉《文物》，1986年5期。

寧夏固原博物館，〈彭陽新集北魏墓〉，《文物》，1988年9期。

趙化成，〈漢畫所見漢代車名考辨〉，《文物》，1989年3期。

趙康民，〈陝西臨潼的北朝造像碑〉，《文物》，1985年4期。

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發掘整理小組，〈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發掘簡報〉，《文物》，1976年10月。

遼寧省博物館文物隊、朝陽地區博物館文物隊、朝陽縣文化館，〈朝陽袁子台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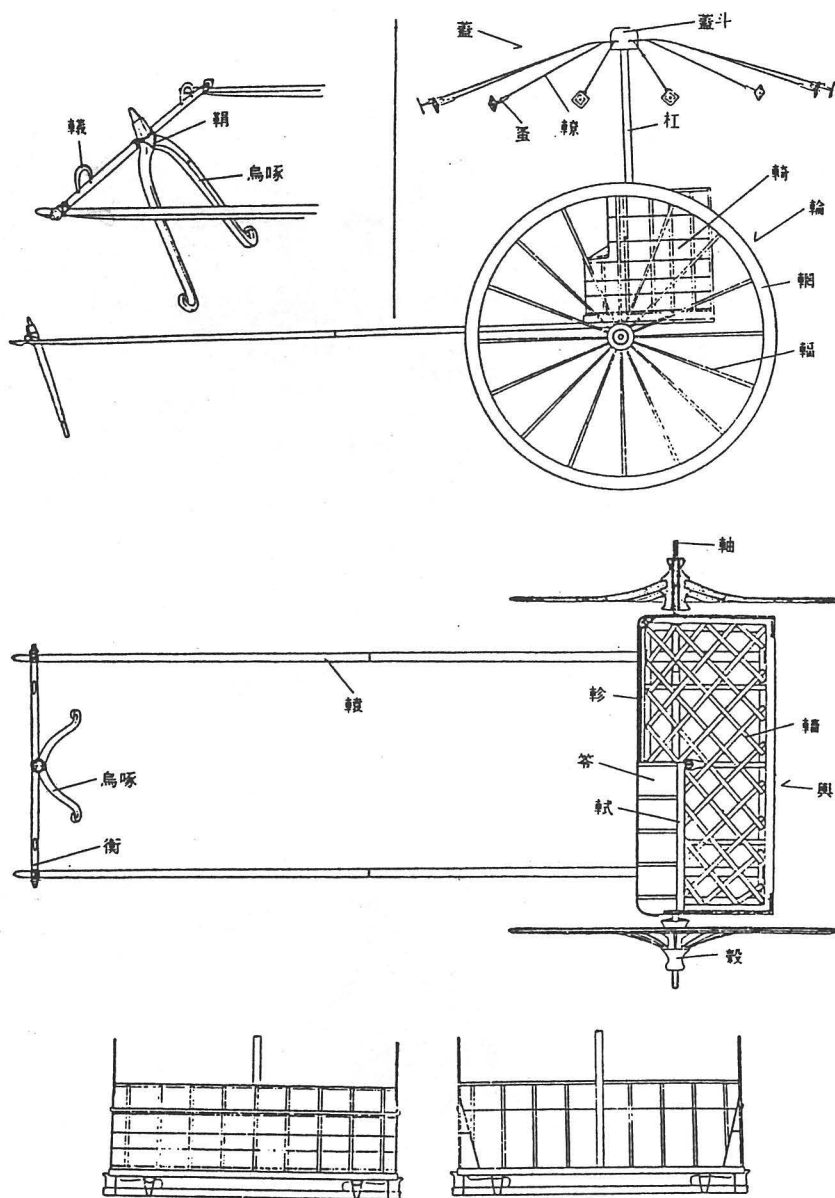
劉 增 貴

晉壁畫墓），《文物》，1984年6期。

閻 磊，〈西安南郊草場坡北朝墓的發掘〉，《考古》，1959年6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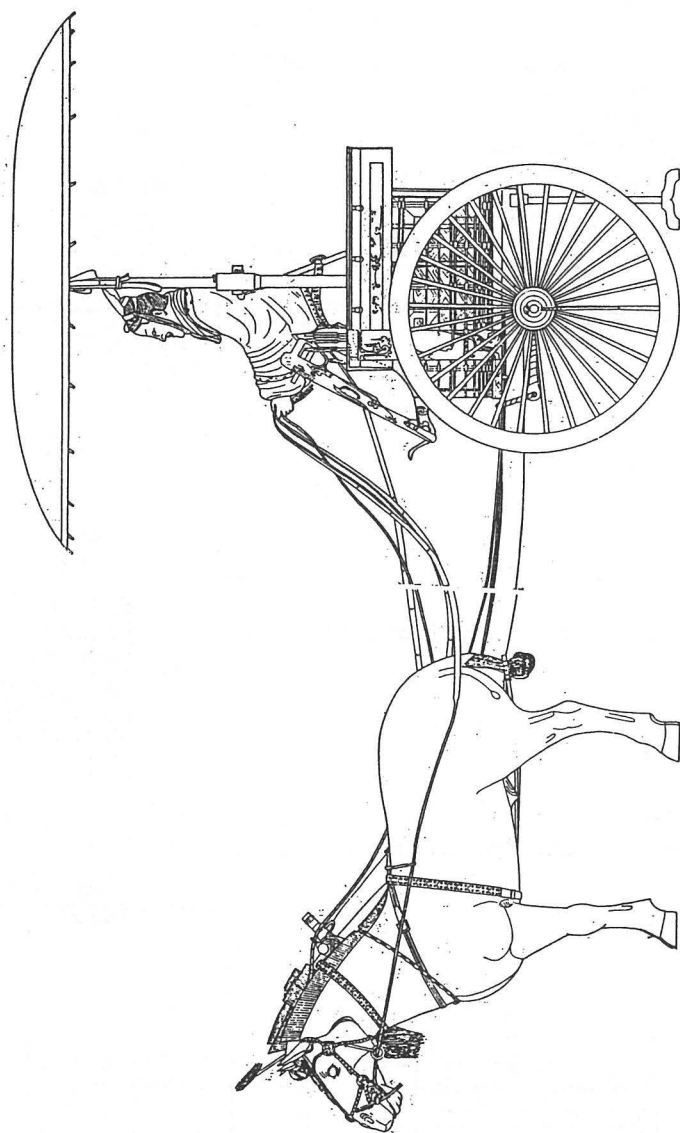
林巳奈夫，〈後漢時代の馬車（下）〉，《考古學雜誌》，49卷4號，1964。

林巳奈夫，〈後漢時代の車馬行列〉，京都大學，《東方學報》37，1966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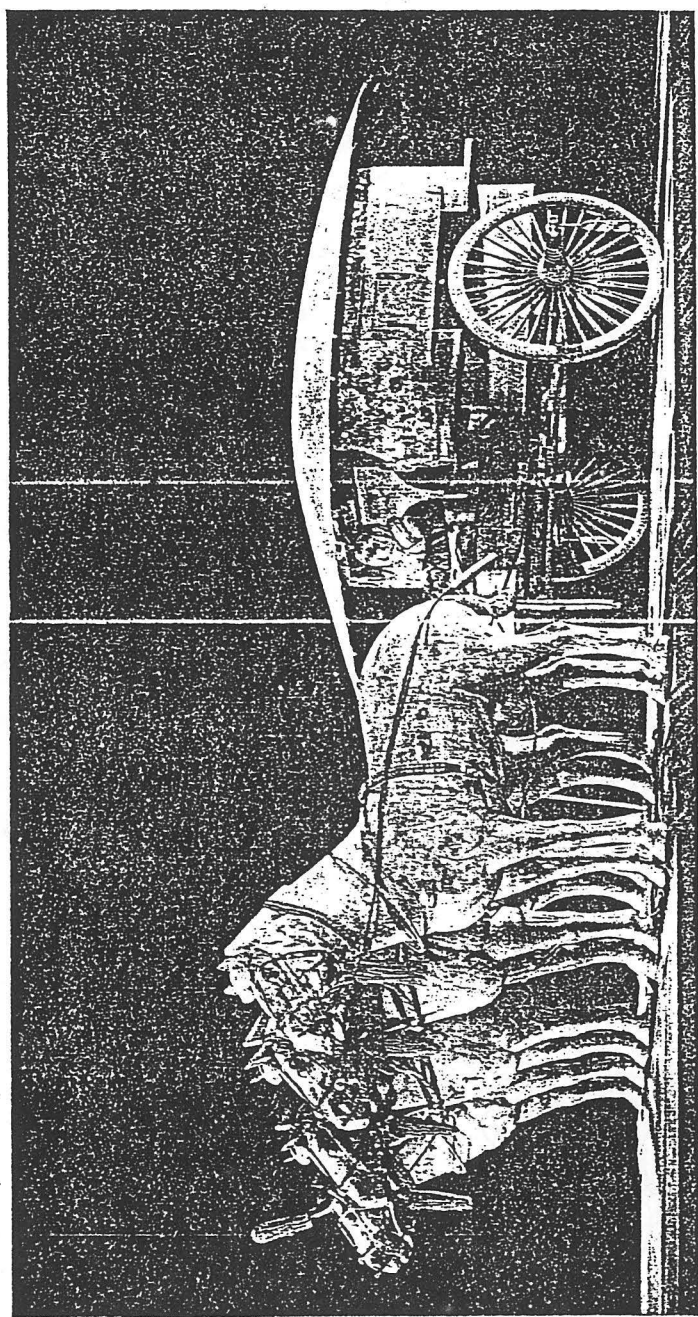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一 車之各部構件圖取自林巳奈夫，《漢代の文物》圖版1頁131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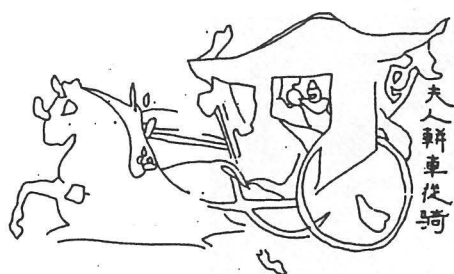
唯圖中輶（輶）爲直輶，不確，當爲曲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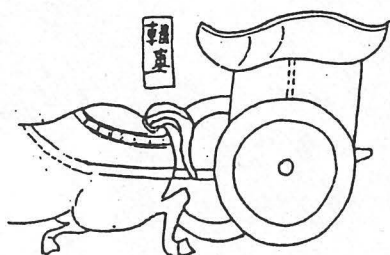
圖二 秦陵一號銅車馬側視圖（《文物》1991年1期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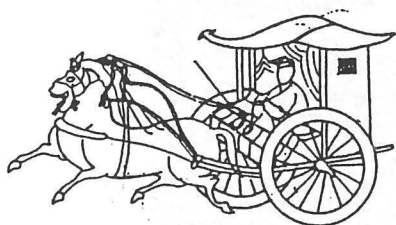
圖三 秦陵二號銅車馬，取自陝西省秦俑考古隊、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，《秦陵二號銅車馬》圖版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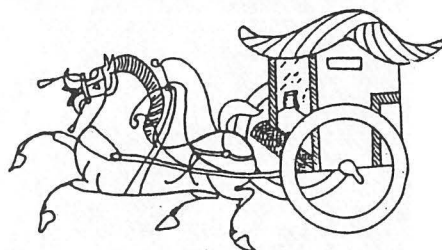
轎車(內蒙古和林格爾漢墓隨葬從騎
陽託駝居鼎出行圖下座中車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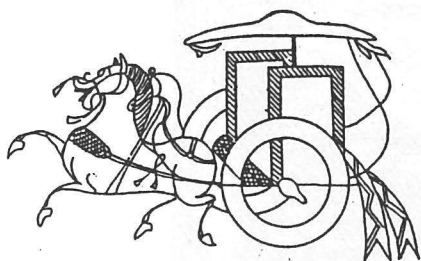
輜車(山東嘉祥縣畫像石,《全集》
初編197圖,車中虛線為筆者所加)



輜車(山東福山縣東窗公画像石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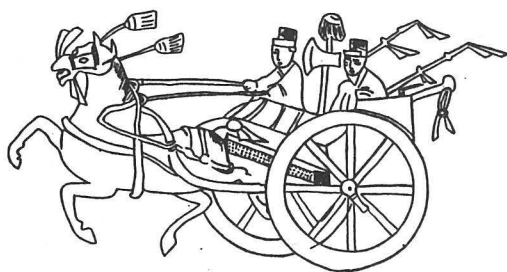
駟車(山東蒼山縣蘭陵画像石)



軒車(山東安丘縣王封画像石)

圖四 輜車、駟車與軒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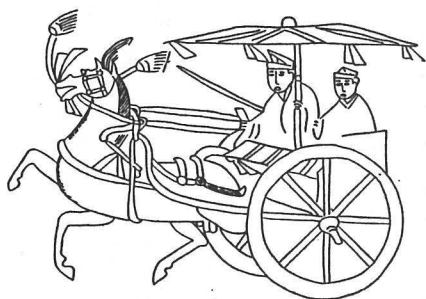
取自趙化成,《漢畫所見漢代車名考辨》《文物》1989.3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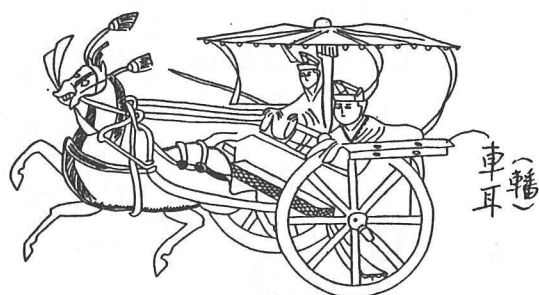
(1) 斧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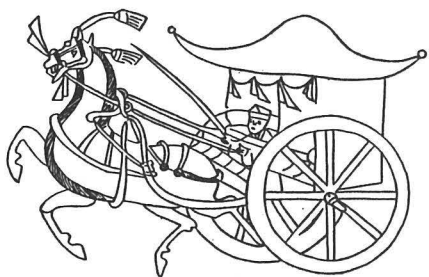
(2) 輅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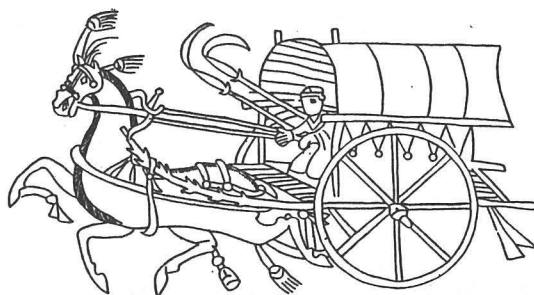
(3) 輅車(馬有障眼)



(4) 輅車(馬有障眼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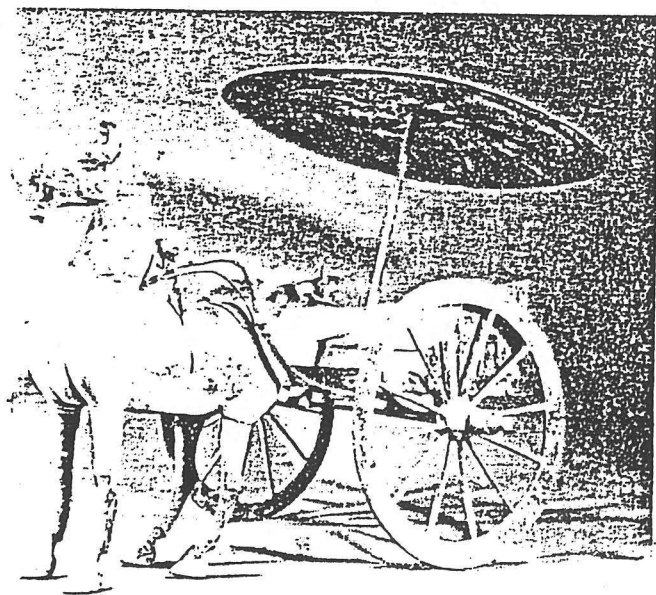
(5) 輅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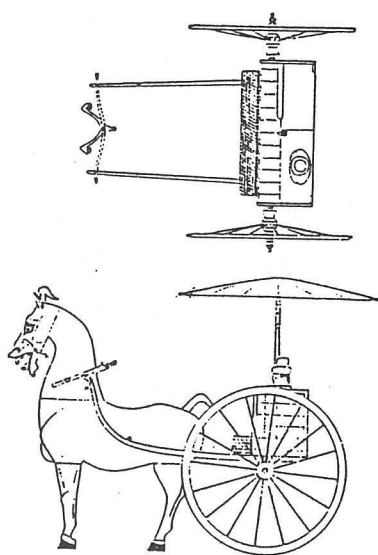
(6) 大車(輦)

圖五 沂南畫像石所見車輛類型

採自《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》，圖版102。



武威雷台漢墓銅車馬（輅車），甘博文，〈甘肅武威雷台東漢墓清理簡報〉
《文物》1972.2



武威磨咀子出土木輅車，甘肅博物館，
〈武威磨咀子三座漢墓發掘簡報〉，
《文物》1972：12

圖六 出土漢代輅車模型



圖七 四維有幡（耳）轎車，東漢，四川彭縣出土畫像磚
《中國美術全集·繪畫編》18，圖199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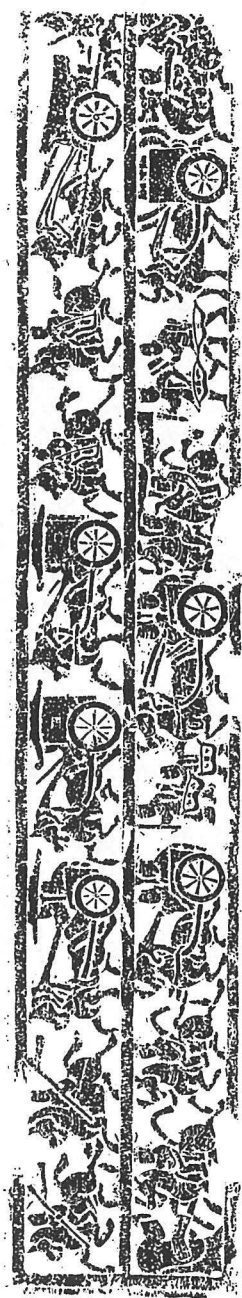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八 斧車，東漢·四川彭縣，《中國美國全集·繪畫編》18，圖200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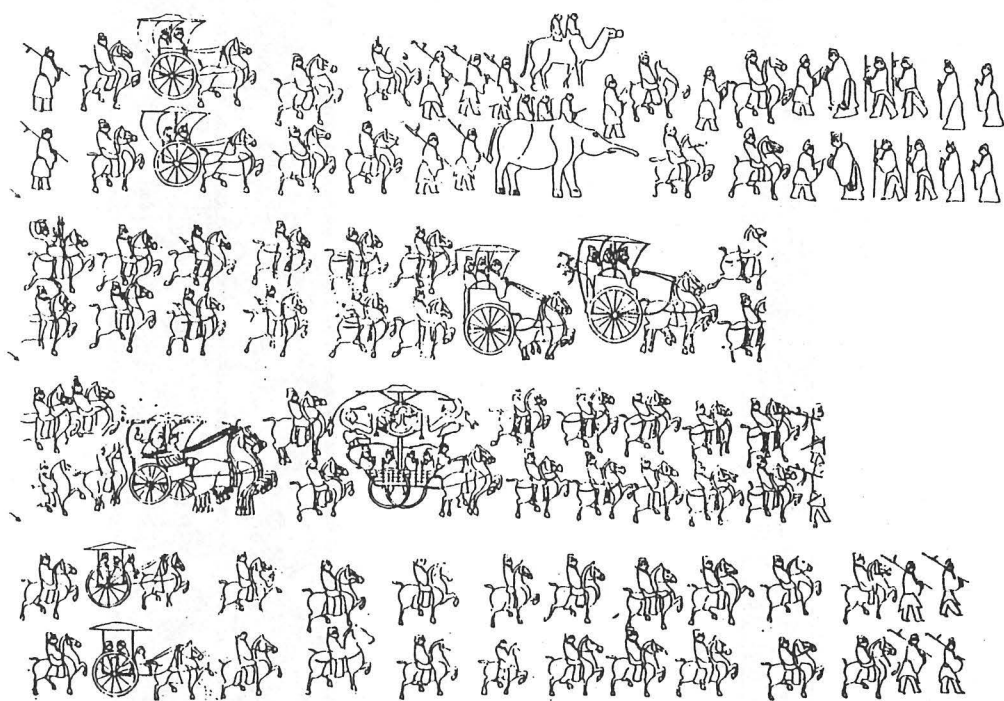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九 東漢末·馬廐圖。浙江海寧長安鎮畫像石

墓室前室南壁上方。五種車，由右至左：輅，赤闕駟車，斧車、輜車、棚車，收於〈浙江海寧長安鎮畫像石〉，文物1984.3。



圖十 車馬出行，《山東漢畫像石選集》，圖371。臨沂白莊出土。



圖一一 孝堂山石室車馬出行圖（摹本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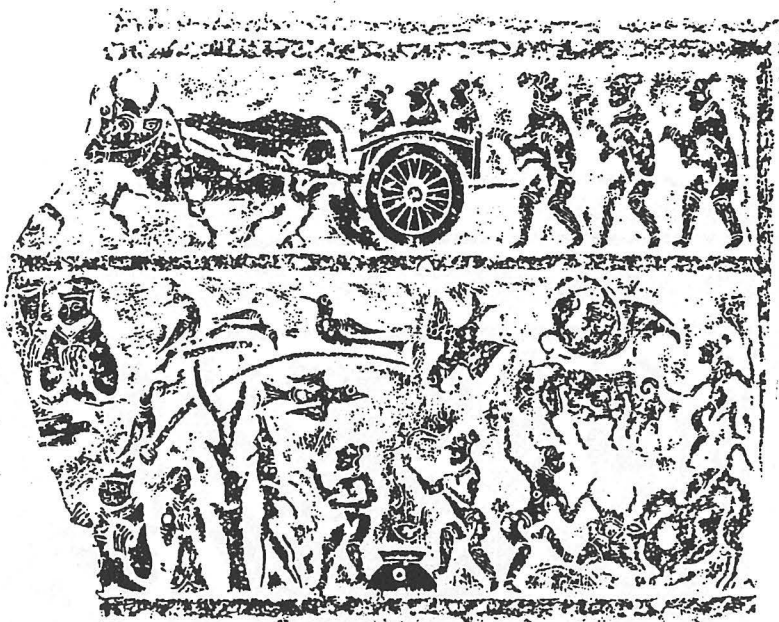
採自林巳奈夫，〈後漢時代の車馬行列〉京都大學《東方學報》37號，
1966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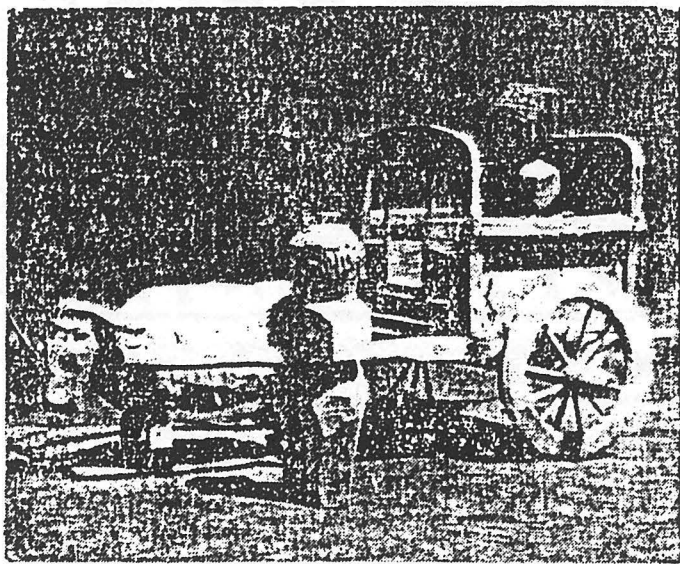
圖一二 山東滕縣大郭村出土，東漢，西王母畫像

下欄牛車坐二人，羊車坐二人，羊身有翅。《中國美術全集·繪畫編》

18，圖25。



圖一三 東漢·濟南城內張出土，牛車坐三人，隨三人，《山東漢畫像石選集》，圖153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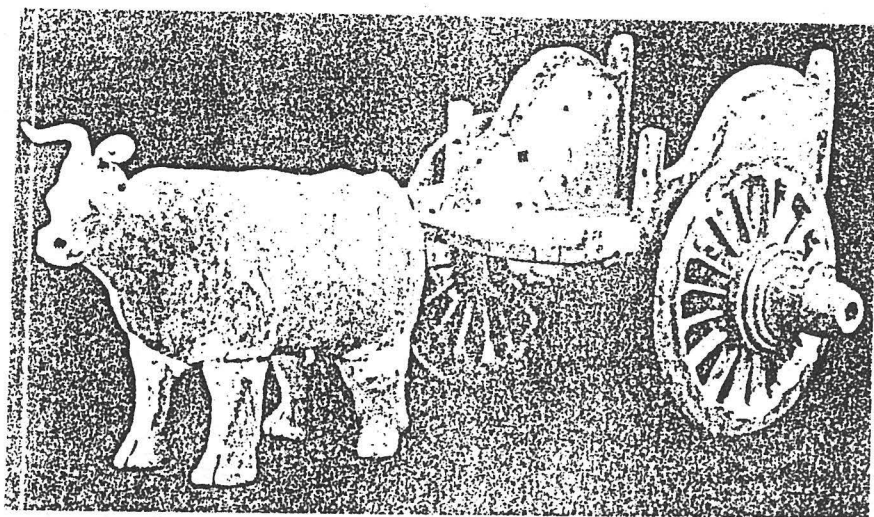
圖一四 東漢·甘肅武威旱灘坡木牛車模型，收〈甘肅省武威縣旱灘坡東漢墓發現古紙〉，文物1977.1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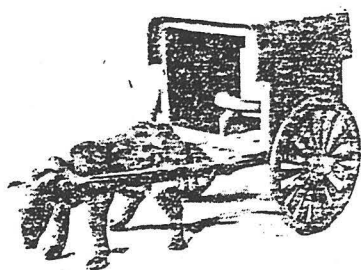
圖一五 東漢·山東滕縣出土，延光元年。第六層二人乘牛車，從一騎。《中國美術全集·繪畫編》18，圖40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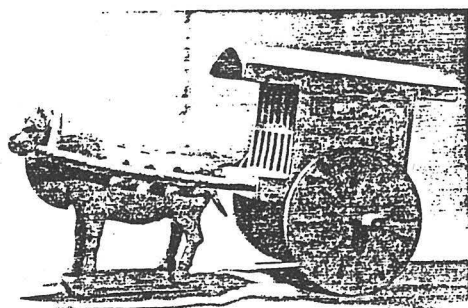
圖一六 魏晉時期墓磚，甘肅嘉峪關6號墓，取自《漢唐壁畫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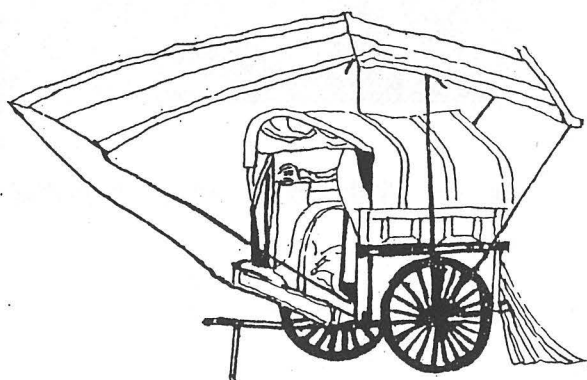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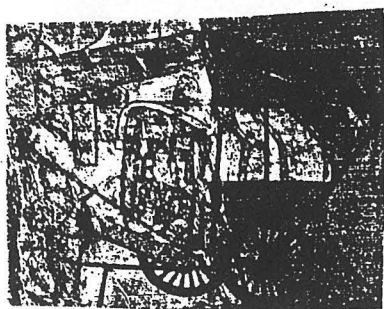
圖一七 牛車。收於〈彭陽新集北魏墓〉，文物1988.9頁39。



圖一八 收於〈南京象山5號、6號、7號墓清理簡報〉
文物1972.11。



圖一九 北魏元邵墓出土陶牛車，側有兩窗、輪幅以塗朱表示。《中國美術全集·雕塑編》3，圖110。



圖二〇 左、北魏·司馬金龍墓漆屏風列女圖上的通幃車，取自《中國美術全集·繪畫編》第一冊，頁158。右爲王今棟據圖所繪見王氏《中國古代車馬》，頁130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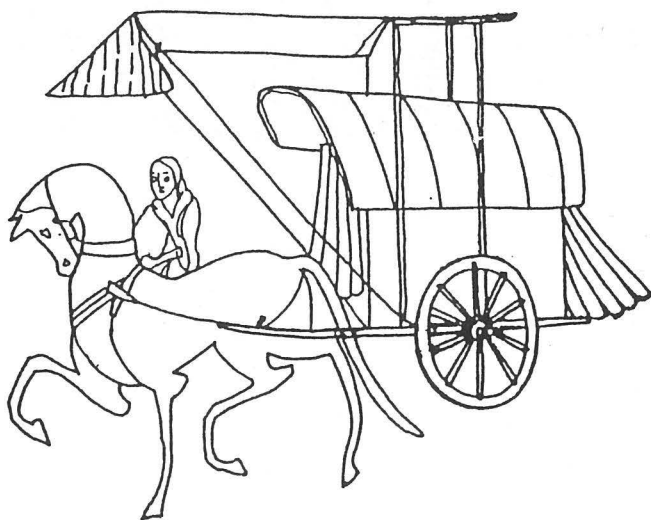
圖二一 通轆牛車，北魏河南洛陽出土。收於王子雲《中國古代畫像石選集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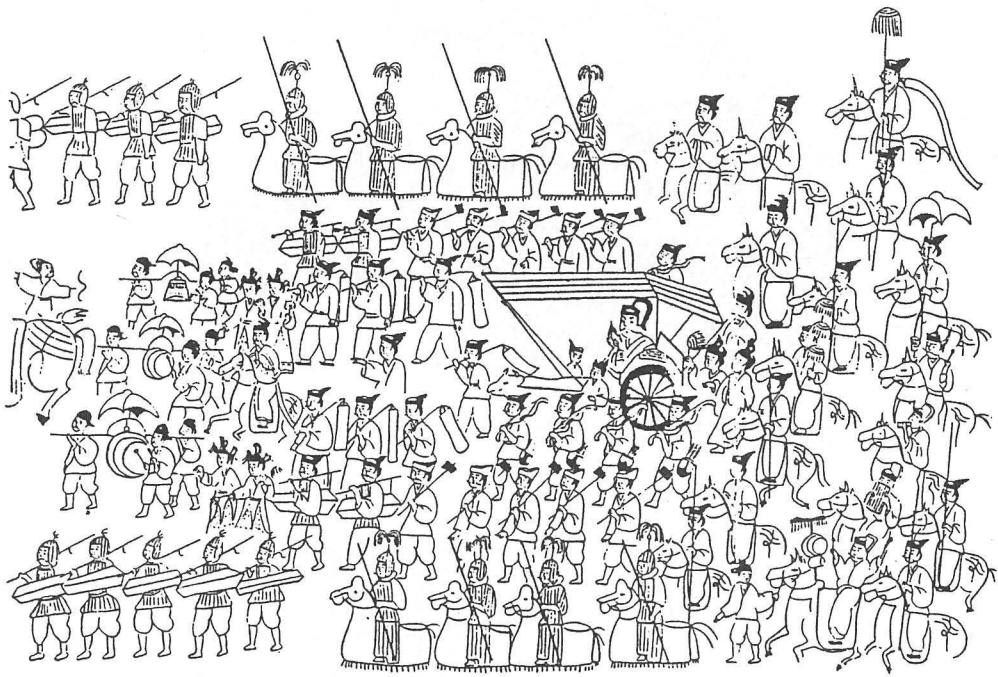
圖二二 北魏・佛座裝飾畫像，女供養人及牛車，收於王子雲，《中國古代畫像石選集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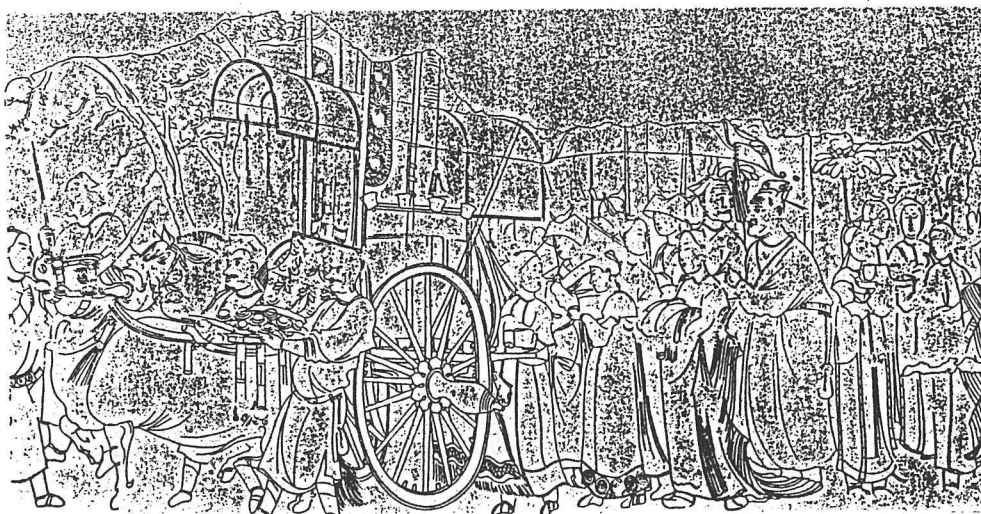
圖二三 北周，供養人及牛車（北周王令猥造像碑）文物1988：2



圖二四 北朝，敦煌壁畫中的有轅馬車，王今棟摹繪，見所著《中國古代車馬》，頁132。



圖二五 冬壽墓 西元357年左右，高句麗・北朝鮮黃海道發現。此為鉤摹圖，見
土居淑子，《古代中國の畫像石》，圖版頁21。



圖二六 北齊婁叡墓壁畫中的牛車。金維諾，〈北齊繪畫遺珍〉摹本。《中國藝術》創刊號，頁21。

漢隋之間的車駕制度跋

勞 榦

在古代車制之中，馬車大致可分為輅車及輜車兩大類，輅車為戰車所改變（論文中的“車之形制與等級區劃”也談到此事），輜車也應為輜重車所改變。古代戰車之制，是立乘三人，中為主將，左為御者，右為車右（左傳閔公元年，“趙夙御戎，畢萬為右”）。原始的戰車是不用蓋（車傘）的，到變為乘車就加上蓋。但蓋是富人才買得起的，凡是不夠多資的人，就不一定有蓋（禮記檀弓，“仲尼之畜狗死……曰……敝帷不棄，為埋馬也，敝蓋不棄，為埋狗也，丘也貧無蓋，於其封也，亦為之席，毋使其首陷焉。”可見孔子乘車亦不曾有蓋。）秦銅車及漢畫的車都有蓋，不過漢代一般庶民的輅車，是否有蓋，就成問題了。車有蓋，較一般車高，所以稱做高車。釋名釋車，“高車，其蓋高，立乘之車也。”所以高車的高，不僅因為立乘，而有高蓋更為重要。一般的輅車原則上都是立乘，如其無蓋，就不是“高車”。這種車蓋一直成為權威的象徵，直到清末為止，凡是各地的主管官員，從督撫到知縣，出來時是乘輅（道員以上為綠色，知府以下為藍色），在輅子前面，一定有人持一個紅色車蓋，作為儀仗。這種車蓋，俗稱為日罩子，到民國時才廢除。

輅車四馬，有蓋有帷（四馬用單轅駕，駕車二馬為服馬，旁列二馬為驂馬），這是輅馬的標準形製。但在漢代卻有許多變化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單轅改為雙轅（但雙轅仍用曲轅，與牛車用直轅的，還是很不一樣），用來駕一馬，如用驂馬，就成為三馬了。林巳奈夫“漢代の車制”所附的圖，就是雙轅車，在漢畫中也時常看到，只是單轅的還是定制。其次，輅車是立乘的，但在漢畫上顯然已有坐乘的輅車。輅車坐乘，這就形制要有所改變。也就是車輿要增大（前後加長，左

右不改)而車軫要變低。車茵的設置,也是爲了坐乘的原故。既然從立乘變爲坐乘,這就可以從前面進出,而後面可以封閉。在本論文中曾特別注意到晉宋以來公卿輅車的後戶,表示是從前方進去的,倘若依照傳統形製的輅車,都是從後面上車,就不可以再多一個後戶了。

輅車中這些演變,是可以溯原到兵車的制度,和常用車制認爲便利的不一樣。兵車的形式,是單轅(軾)駕二馬,從後上車,前方的軾較高(參閱希臘陶瓶,即vase,上的戰車,和中國古代戰車,也是一樣),這些都是爲了作戰的方便。用單軾而不用雙轅,爲的是單軾牽的兩馬較雙轅下的一馬,在行動上更爲自由,可以盡情的馳騁,而增加攻擊的效用。漢書五十二“竇田權韓傳”,武帝說諸臣“局趣(即局促)效轅下駒”,駒仍是一般的馬(見史記會注引中井積德說),只是雙轅下的馬,受到限制,不能行動的十分方便。這是在戰場上用馬的條件,至於在平時,這種條件是不必需的。其實一般乘人的車,一馬即已夠用。爲了節省,漢代採用雙轅一馬制(仍是曲軾,與牛車或輦車直轅的,還是不一樣),也是一種合理的發展。

至於從後上車,那也是爲了兵車在前面要裝配防禦性的板或革,而較高的軾也一樣爲了保護直立的戰士。所以也要加高,但對於平時乘車的人,就不必這樣了。至於從後上車,爲了慣性(inertia)的原因總是從後墜車,韓安國就因此耽誤了丞相的任命。如其從前面上車,墜車的機會就減了,這也可能是變更的原因。

論文中詳細的討論過從馬車的廣泛使用,變爲以牛車來代馬車的問題。其中論據都是很好的。現在再來補充一下。論文中特別拿出一部分來討論牛車的被重視,極有見識,所引材料也甚爲充足。對於牛車在魏晉以來社會中重視的原因,也一一舉出,加以分析,在方法上也是正確的。爲了這個問題還有許多難以解決的疑點,因而討論還是必要的。

在西漢時代,牛車和馬車相比,牛車爲貧賤人所乘,那是沒有爭論的。漢書三十八齊悼惠王傳,說,“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,貧者或乘牛車”,這是說原來有分裂趨向的“諸侯”垮了,“貧者或乘牛車”意思明白,所有其他解釋都是錯的。漢書五十九張湯傳:“載以牛車,有棺而無槨”和後漢書五十四楊震傳:章懷注引謝承書:“震臨歿謂諸子,以牛車薄簣載柩還歸。”張湯和楊震的路線,雖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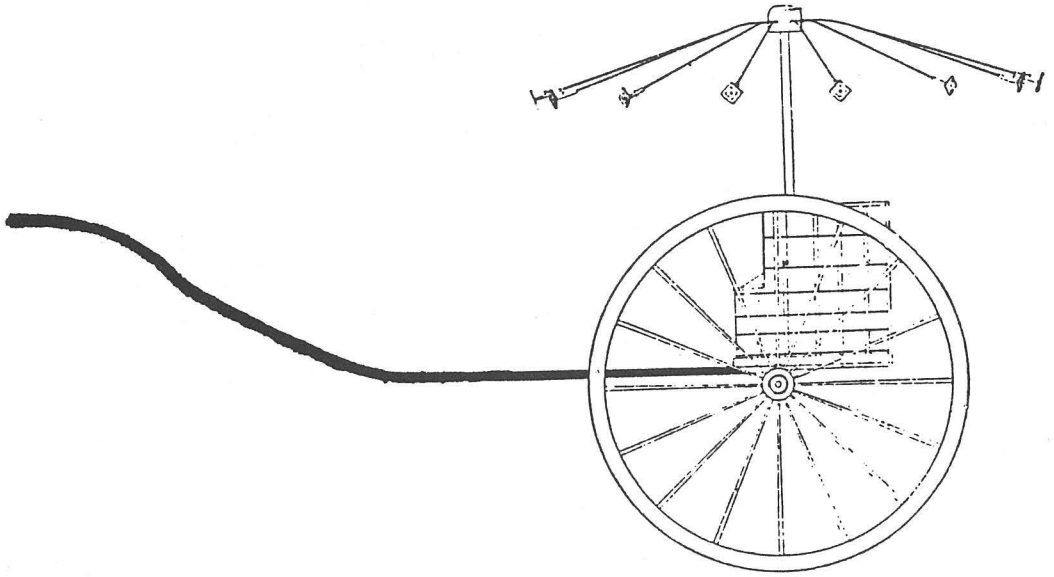
很不相同，但爲了表示清廉和冤抑，情況或有些類似。雖然一在西漢中期，一在東漢晚期，牛車不是華貴車乘，還是同樣的。至於兩漢之際，馬匹缺乏情形，可由後漢書光武紀（後漢書一，上）“光武初騎牛，及殺新野尉，迺得馬。”表示馬匹缺乏情形，但依據後漢書二十四馬援傳：“從容謂官屬曰，吾從弟少游，常哀吾慷慨多大志，曰士生一世，但取衣食裁足，乘下澤車，御款段馬，爲郡掾吏，守墳墓，鄉里稱善人，斯可矣。”這可能是西漢末年的事。當時郡中掾史，歸里以後，還可以“乘下澤車，御款段馬”款段馬指慢馬（不是良駒），下澤車大約指下鄉的車（不是盛飾的車）。馬援是扶風人，屬於西北區域，和光武在南陽，屬於中原區域的不一樣。但馬少游和馬援談話時，也可能早一點，是在天下動亂以前。這就論文中引用的東漢時期，比較普遍使用牛車的，多少有些區別。

習慣上的改變，光武帝的提倡節儉，可能是一個催化劑，卻不敢認定爲主要因素，因爲光武並無禁止一般士庶用馬車的證據。在漢高帝時曾禁賈人“衣絲乘馬”可是後來商人還是違禁的“衣絲乘馬”。禁令尚且不能支持久遠，提倡恐怕不一定能形成決定的力量。我覺得論文中引證過的世說新語，品藻篇：

陸子所謂駑馬有逸足之用，顧子所謂駑牛可以負重致遠，或問，如所目，陸爲勝耶？曰駑馬雖精速，能致一人耳，駑牛一日行百里，所致豈一人哉？

在應用上，牛比馬更爲經濟實用。馬較快速，牛有持久力量。東漢時代，正是南方加速開發時代，本來馬匹已大量減少，再加上長江中下游氣候對於養馬是不適的，東漢開國以來國力已大非昔比，所能控制的邊疆地帶大爲縮小，也影響到馬的來源。漢代也是車制的變革時代，輶車的變化，前文已略爲敘述，牛車系統也是在變化之中，在實用方面走去，漢代兵車已就廢棄，輶車只留一個形式。對於缺乏馬匹狀況之下，一般人家中假如還有馬，寧可以採取可以兩用的輶車作爲“下澤車”而不必保留只有虛文的輶車。這種一步一步轉變，經過了幾個世代，到了漢末時期，如論文引後漢書七十八單超傳：“其後四侯轉橫，……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”那是本人仍乘馬車，僕從乘牛車，再以騎馬的人隨從牛車，其貴賤之序爲馬車，牛車，單騎，牛車的地位已經升高，再進一步貴胄之士也乘牛車了。

(1)漢代單轅（輶）車的標準形式依林巳奈夫“漢代の車制”圖改



(2)漢代單轅（輶）車的標準形式

